

蒙古族簡介

編輯部

中國民族支系繁多，要談在國史上立有最大軍功的，自非蒙古民族莫屬了。自來論蒙古族者，總要將蒙古族跟國史上某個民族在族源上聯繫起來，所以對蒙古民族源流就有了：匈奴說、突厥說、吐蕃說、華夏說……等等說法。國際侵略者御用「學者」爲了方便替帝國主義尋找掠奪蒙古的藉口，甚至師心自用創造出蒙古跟斯拉夫或者蒙古跟大和民族同源的神話，這些說法或神話都經不起歷史文獻或體質表徵的考驗，其實自人種起源多元論出現後，不同民族各有起源，不必然要跟歷史上某些民族有血緣上一脈相承的關係，但在相同或相似的生存空間條件下，產生出與生存空間相適應的生機類型（也就是文化模式），則是必然的結果。因此蒙古民族就是蒙古民族，不必然以之爲匈奴、突厥、吐蕃…的後裔。

蒙古一詞首見於國史者爲《唐書》、《新唐書》，遼金之際漸次強大，十三世紀初出現了一個偉大的英雄人物—博爾濟錦·鐵木真，統一了大漠以北各個民族，在西元 1206 年，大會被征服不同民族的各部落，被推尊爲成吉思汗，意思是「眾汗之汗」或「萬王之王」，跟唐初李世民被推尊爲「天可汗」（普天下的可汗）意思相當。從此建立了蒙古大帝國，前後發動了三次西征，兵威所及遠達歐洲的多瑙河，蒙古大帝國疆域之廣袤爲人類史上前所未有，曾被外國史家稱之爲「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死後，帝國分爲中國本部、金帳、伊爾及察哈台三汗國、蒙古民族也因而分布世界各地，不過都很快的融入了當地主體民族之中。

蒙古在成吉思汗時，曾命乃蠻部的塔塔統阿以畏兀兒字母拼寫蒙古語，這種蒙文現在仍在大陸內蒙古地區使用，算算也有七百多年了，一般以老蒙文稱之；後來元世祖忽必烈時，又命吐蕃薩迦派高僧八思巴參照梵文另行製造蒙文，通稱八思巴蒙文或蒙古新字，不過這種蒙文隨著元朝滅亡，就不再使用了。明末清初西部厄魯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達爲了更正確表達厄魯特蒙語的特性，在老蒙文基礎上，加以改造，創製了第三種蒙文稱之爲「托忒體蒙文」，到現在還在西蒙古地區流行。西元 1924 年蘇聯侵占漠北外蒙古，一手塑造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強制以斯拉夫字母拼寫蒙古語，一般稱之爲「息立爾蒙文」，有時也稱之爲新蒙文。一個民族而有四種文字，洵不多見。

在牧區的蒙古人，一如傳統草原游牧民族一樣的豪邁、爽朗、熱情、好客，宴客時必然是酒肉齊上，歌舞併陳，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目 錄

達賴喇嘛 2004.3.10 演講之分析	楊開煌	1
蒙古時局與周邊關係	吳楚克	17
女真東北面登場的朝鮮太祖李成桂研究.....	王永一	27
新譯注釋《蒙古秘史》漢文版的幾點補充.....	泰亦赤兀惕・滿昌	39
隋唐盛世胡風熾	劉學鈞	55
稿 約		74

達賴喇嘛 2004.3.10 演講之分析

楊開煌

〔東華大學公行所教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

每年的三月十日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所謂的「抗暴紀念日」，今年是第四十五週年的紀念，達賴喇嘛循例也發表演講，而在中共與達賴喇嘛的互動中，達賴喇嘛每年三月的演講無疑就是這一年雙方關係的「溫度計」，因此從詮釋學的角度深入分析達賴喇嘛的講詞，對比了解中共與達賴喇嘛的關係變遷是十分有重要的參考文獻，當然從整體的趨勢來看，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仍然是互不信任的關係，不過此種不信任關係存在正負兩種因素，從正面來看，雙方關係著一個十分安全的底線，既不會有戰爭的危險，從負面關係來看，雙方也都有充裕的時間來拖延，所以兩者關係的解決具有一定的困難。

關鍵詞：達賴喇嘛、中共策略、流亡組織

一、講演的背景：

當達賴喇嘛預備在今年三一〇講演時，必然也回顧一下自去年「三一〇講演」之後的雙方重大事件，個人以西藏之頁的「即時新聞」專欄以及蒙藏委員會之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二卷第五期和第十二卷第六期，所列入的事件篩選如下：

2003.03.10 中共發佈西藏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白皮書。

- 2003.04.29 達賴喇嘛說中國新領導階級仍未改變西藏政策。
- 2003.06.01 尼泊爾遣返 18 名西藏難民。
- 2003.06.04 中共青海省立法保護青海湖及其河流。
- 2003.06.17 青藏鐵路部門為藏羚羊通過青藏鐵路建立四處野生動物自由通道。
- 2003.06.24 印度首次明確承認西藏屬中國領土，相對中國也同意透過印度東北邊境錫金地區進行雙邊邊界交易。
- 2003.07.14 流亡組織發表「西藏流亡白皮書」。
- 2003.07.26 西藏區領導人會見印度訪客，中方鼓勵印度公民來藏觀光和經商。
- 2003.07.30 中國與澳大利亞進行人權對話，澳大利亞人權代表團訪問拉薩，以實地了解當權人權。
- 2003.08.07 尼泊爾與西藏區政府簽署備忘錄加強雙方的旅遊業合作。
- 2003.08.12 中共宣佈對布達拉宮之遊人設限。
- 2003.08.20 中國拒絕嘉樂頓珠提出允許流亡組織幹部訪問中國及西藏。
- 2003.09.04 達賴喇嘛訪美舊金山、布魯明頓、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
- 2003.09.12 中國抗議布希總統、鮑威爾國務卿與達賴喇嘛會晤。
- 2003.09.17 達賴喇嘛特使要求第三度訪問北京。
- 2003.10.08 鋪軌 290 公里，青藏鐵路向拉薩延伸。
- 2003.10.16 尼泊爾希望與中國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與經貿旅遊的合作關係。
- 2003.10.20 第四屆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會在布拉格舉行，中共對捷克表示遺憾。
- 2003.10.28 中印在積極解決邊界問題，印國防部長表示願意與中共解放軍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 2003.10.31 西藏地區今年經濟成長可望 12%。
- 2003.11.18 印度軍方首次獲邀進入大陸西藏地區訪問。

2003.12.13 西藏捨救保護藏文古籍 600 餘部，編彙藏文古籍 43 種 200 多部。

2004.02.13 西藏流亡組織對藏青進行遊行活動時與警方衝突表示遺憾。

2004.02.17 噶瑪巴稱西藏問題也是印度問題。

2004.03.01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將中國列為「特別問題國家」。

我們從以上的信息來看，可以發現在這一年對達賴喇嘛而可以感覺到：第一中共的治藏政策完全沒有因為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互動而有所變化，這是中共以自身的行動來說明達賴喇嘛對西藏影響力的消失；其次是中共治藏政策似乎有了信心，西藏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也越來越全面；其三是中印關係的調整，中尼之間關係的改善，大大壓縮了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活動的空間也使得達賴喇嘛更加緊張；其四達賴在國際間政府的支持也越來越有限，在此一背景下，中共又無意加速通過會商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而達賴喇嘛自己的年事日增一日，因此達賴喇嘛的講演必然要傳達某些信息。

二、講演內容：

我們細讀達賴喇嘛今年的演講稿，可以強烈地感受由於時間的急迫，中共治藏的績效以及中國在國際和週邊國家之間的外交成就，因此大大擱置了中共對達賴喇嘛問題解決的壓力，因而使得達賴喇嘛對中國強烈的不信任、對中國發展的不信任、對中國解決西藏問題的不信任，而對印度則是採取更依賴的做法。

首先是對中國領導人的不信任，在講稿的開始達賴喇嘛回顧了一九五四年與毛的見面，按達賴喇嘛的描述，這次見面所得到對於漢藏民族在和平與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平等相處的未來充滿了信心。然而話鋒一轉就顯示出對中共的不信任，他說「我剛剛返回西藏，中國就發生極端主義的政治運動，社會由此陷于紛亂不安中。」由於中共政權的轉變，從而表現為對西藏的高壓政策，導致一九五九年的「抗暴鬥爭」，所以按達賴喇嘛的邏輯是西藏問題的起源是中共政權不講信用轉變了對西藏的承諾的結果，但

是我們重讀一下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中關鍵的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¹」這裡在協議中已經說明了中共治藏的兩大重點：一是西藏地方必將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如果達賴喇嘛和其他西藏的官員貴族，只願看到中央「不加強迫」，或是認為中共所講的「幫助西藏發展」，就是為了鞏固原來封建地主、貴族的統治模式，則應該說是雙方對協議的誤解，而非有意欺騙；二是人民提出改革需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協議中用「得」而非必須或應當，因此在法理上中共強制推行「民主改革」，如果一如達賴喇嘛流亡組織所稱未與當時西藏地方幹部協商的話，也並不存在違反協議的問題，因此，達賴喇嘛的攻擊在國際法是未必成立的。在講稿中也提到胡錦濤、江澤民，但主要的內容是講達賴喇嘛自己的願意，他希望 2002 年 9 月、2003 年 5~6 月的聯繫能繼續，也希望他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進行會晤，而這些願望的「潛台詞²」則是在指出中共的領導人並不願實現他的願望。

其次是對中國政府是否有會談意願的不信任：達賴喇嘛說「爲了繼續現有的聯繫渠道，我不僅要求我的代表設法儘早前往中國，而且也期望他們不必延擱時日而能夠早日成行。因爲這有助於讓西藏人民和國際社會中的西藏朋友們對現有的聯繫渠道建立信任與信心。目前，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有和解誠意以及是否願意啓動和談感到懷疑。」然而達賴喇嘛似乎沒有注意到中共政權對達賴喇嘛的誠意也同樣是懷疑的，例如在 1979 到 80 年代，中共與達賴喇嘛代表曾有過六次的接觸，特別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在位，雙方都已經接近預備推派人選進行談判的階段，最後是因爲達賴喇嘛方面堅持要求在雙方談判中在達賴喇嘛的陣營中，必須要有外國人參與，而告中止，因此中共政權在與達賴喇嘛接觸上自然採取了更加審慎的方式，以免自己在西藏問題上重蹈覆轍，又如達賴喇嘛口口聲聲講不追求獨立，但是就在自己的講稿中，明文用語「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¹ 《當代中國西藏》，北京：當代中國出版，一九九九年，頁 165。

² 「潛台詞」是大陸用語，是指在公開講詞背後的意含。

直接進行會晤。」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如果達賴喇嘛心中已經真正不追求「獨立」的話，他的講法就應該是「我願意和中央領導人會晤」有了這些不協調的、自我矛盾的跡象，中共政權也很難信任達賴，何況以當下的西藏問題本身而言，對中共的民族幹部而言，也是以建設西藏為當務之急，而不是與達賴喇嘛的接觸會談為優先。

其三對中共建設西藏的不信任，達賴喇嘛說「西藏目前的現狀不僅無益于西藏人民，而且對中國政府也沒有任何好處，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建設項目雖然宣稱是爲了利益于西藏人民，實際上這不僅無益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損害了西藏人民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與民族語言文字的努力。漢族大量移民西藏的結果不僅使西藏人在經濟領域喪失權利而被邊緣化，而且西藏的民族文化也被大中國的文化侵透而正在失去自性。」那麼應該如何建設西藏才能算是有「好處」呢？達賴喇嘛說「西藏人民必須能夠自由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保護西藏原始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合理規劃西藏的建設與發展事業。」達賴喇嘛的說法也就是說中共的建設西藏他不信任，然而經濟建設、現代化的近程本來就存在相對客觀的標準，目前中共對西藏的開發和建設也只是西方社會現代化的翻版而已，如果只強調自己掌握或是由藏人，開發才是合理的話，這種論點只是以立場來論經濟，而且是以階級來評論建設，大大違背了達賴喇嘛在演講後段所一再強調的「普世價值」，中共在西藏的投資，發動各省對西藏的援建，以及西藏大開發中「青藏鐵路」的建設，這些都是「損害了西藏人民的根本權益嗎？」中共在西藏設立藏羚羊的保護區³，大陸有人努力申請將藏羚羊作爲 2008 北京奧運的吉祥物⁴，要求漢族幹部「學藏語、用藏語，要求 3-5 年的時間使漢族幹部以藏語爲第一語言，能說、讀、寫⁵」，西藏近幾年每年約有 12%經濟成長，這些都是達賴喇嘛所說的「非合理的西藏建設」、「使西藏民族文化失去其自主性」的政策嗎？足見當我們在討論某些政策時，如果只有「立場」，必然沒有所謂「普世」的是

³ 作者於 2004.8.8~8.9 去過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護區，那是由中共開發，由藏人自行管理的保護區。

⁴ 訪問西藏時得知的信息(見附件)。

⁵ 趙貞、徐紅雲，《我區公安邊防官兵學藏語、用藏語促部隊建設》，西藏日報第五版，2004 年 8 月 9 日，第五版。

非，達賴喇嘛認為由西藏人自己改善其生活，規劃西藏建設，事實上，中共在規劃西藏的發展時，難道不正是由藏族幹部和中央以及其他兄弟省市討論西藏地區當前的需要，而加以援助、加以投資的嗎？看看八角街的市容，看看如今拉薩的市場，我們很難看到達賴喇嘛所說的「藏人的痛苦」，在建設西藏現代化的過程，我們看到的是看到的是漢人在哪裡賺錢，藏人也在那裡賺錢，漢人的生活改善了，藏民也開始過新社區的生活，這不是經濟發展的「普世價值」，難道在藏參與西藏現代化規劃，參與西藏現代化建設的藏人都不是達賴喇嘛眼中的藏人，難道只有在達賴喇嘛或流亡組織領導的人才是藏人？西藏的現代化是包括了全體藏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並每沒有獨占的權利。

其四對中國現代化的不信任，達賴喇嘛在他的演講中對中共政權問題的攻擊這並不意外，因為達賴喇嘛主張獨立，而中共反對分裂，政治立場決定了解釋政治問題的角度，然而達賴喇嘛對中國現代化的不信任，則是一反去年演講的主調，而就在去年達賴喇嘛的說法是「由於江澤民繼續了鄧小平時期開始的改革開放，因而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經濟、貿易、外交領域等方面變化尤為突出，對這一切都是表示歡迎⁶。」然而去年的肯定到了今年他則認為「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國的各項事業雖然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在經濟等一些領域也出現了不少的錯誤或挫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於不能正視現實而缺乏切實的方法。為了正確地認識和正視現實，允許自由地傳播信息是極為重要的。」中共政權對中國現代化的建設中，確實有不少的問題和不協調、不穩定的地方，但是這問題並不來自傳播信息的自由不足，而是來自中共自身意識形態的堅持，事實上，由於大陸已經有了上億的網民，因此信息不自由的情況，絕對不是中共發展上挫折的根源，同時達賴喇嘛也說到「中國在成為亞洲乃至於國際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時，也伴隨著對中國的疑懼、不安與恐懼，要消除這些疑慮，僅僅通過宣傳解釋或成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東道主是不夠的，只要中國政府不停止對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對少數民族享受正當的政治、社

⁶ 達賴喇嘛，《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三·一十自由抗暴四十四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2003年3月10日。

文轉自：<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3/index.html#030310.2>

會等自由施行壓制，國際社會就很難相信中國是一個致力于和平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事實上，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評價也是有各種的聲音，達賴喇嘛附合的論點只是美、日等國家的極右派、高度仇華反中的一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和美國的軍火販子，以及其所支持的政客，如布希、錢尼、拉姆斯斐爾德之流，他們才對中國崛起有恐懼、有不安，亞洲各國的人民並沒有相同的感覺，反而是在世界各國的人民，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流氓行徑，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種種事跡，反而大大不安。歐洲人對布希以武力、霸權去推銷美國式民主的行徑，不但沒有任何的讚美，反而是提出「anyone but Bush」(簡稱 ABB)的強大反對之聲，如今看來已是美國的小布希政權才是最不知道寬容，最不尊重普世價值的世界公敵，因此達賴喇嘛如果真正認為宗教所倡導的「寬容、自由、正義、尊重普世價值」是一種人類共同的理想，則應該以同樣的標準去譴責美國的小布希政權，正像希臘 3000 名反戰的雅典人所說指責美國這超級大同一樣「是一個從來不尊重國際準則和世界人民生命」的國家⁷，當達賴喇嘛真正具有普世的道德而能夠成為人類普世價值的代言人之一時，達賴喇嘛對中共的指責，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其五討好印度，在過去幾年達賴喇嘛的演講中，也都會提到他不尋求獨立的主張，提出他的「中道思想」，而今年的講詞並沒有直接重覆他不尋求「西藏獨立」的主張，而只提到他的「中間道路」，不同的是達賴喇嘛強調他的「中間道路是和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相吻合」，換言之，所謂的「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主觀地去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中國境內的藏漢民族融合的利益，同時從中共的立場來看，西藏是中國的地方政策，其他國家根本不應該有「西藏政策」，正如同中國不會在對印度的外交關係之外還會有一個「錫金政策」或是有一個「孟買政策」一樣，所以對中共而言，各國的「西藏政策」這就是干預了中國內政，然而達賴喇嘛反而將自己最主要的主張說成是符合印度的西藏政策，此種心態所提出的政策，有可能說服中共領導接受嗎？同時達賴喇嘛也把「西藏問題」有意無意描寫為中、印關係之間的重要問題，事實上，中印關係在中共承認錫金為印度的一部份，印度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省之後，雙方早就沒有西

⁷ 中國時報，民 93 年 8 月 22 日。

藏問題的困擾，唯一剩下的只有達賴喇嘛個人前途安排的問題，此一問題印度在國際的壓力下以及印度自己的國家利益考量下暫時也不會去解決，因為達賴喇嘛畢竟年事已高，一切的困擾時間都可以解決，所以中印之間根本不存在「西藏問題」的困擾。當然站在達賴喇嘛的立場，他很希望西藏問題成為中印之間的主要問題，但「流亡組織」恐怕更希望印度政府停止與中國的和緩的外交⁸，顯然中印越是有衝突越是有糾紛，「流亡組織」在印度才能愈穩固，達賴喇嘛的公開講演自然不可能提出為此不切實際的想法，但是從他的講演我們仍然可以覺察到他對中印關係改善的憂慮和不安，從希望「流亡組織」能在中印關係之間扮演一定的角色，其用心可以說是十分明顯。

綜合而言，個人以為達賴喇嘛今年的演講在對中共政權態度是比去年倒退，而且更加不友善，因此如果達賴喇嘛真正期望在今年內能和中共政權有所接觸的話，恐怕此一期望是要落空了，除非中共政權在對達賴喇嘛的戰略上有了比較新的考慮，否則今年的雙方關係也就不能太樂觀。

三、中共與達賴喇嘛互不信任的根源：

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交惡已經四十五年，期間達賴喇嘛從追求「藏獨」到追求「西藏高度自治」按理說中共政權理應滿意此一鬥爭的勝利，換言之，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談判障礙理應消除，然而何以雙方的互動仍然指市若干外圍的接觸並沒有實質的進展，從中共方面來看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的種種表現，至少有三點是中共無法真正相信的。

第一：達賴喇嘛聲稱「廣大的西藏人民對我抱著極大的信任和期望，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承擔能夠代表他們意志的自由代言人的職責。」然而所謂的「中間道路」似乎除了達賴喇嘛一個人在講之外，不論是西藏之頁或是西藏基金會的網站，或是西藏通訊等與海外藏人所設的網站或雜誌，幾乎沒有其他的人熱烈呼應或深入討論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主張，反而我們在海外藏胞的網站看到最多的是西藏宣傳自己的憲法，所有的宣傳品都是以「國家」來自稱，以敵視、仇視的態度來稱呼中國，西藏

⁸ 《藏人抗議中印邊境談判》，西藏通訊第46期，2003年9月~10月。
文轉引自：<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6/index.html#17>

青年會更是直接宣傳「獨立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途徑⁹」，在此情況下，有可能是達賴喇嘛的立場海外藏胞不能認同，也有可能是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以兩手策略來對付中共，如果是前者，達賴喇嘛便不能自稱自己是代表了海外藏胞，如果是後者，則中共不信任達賴喇嘛的說法，就沒有錯，因此在達賴喇嘛釐清他和海外藏胞相反的論述之前，中共政權自然不會和達賴喇嘛進行有意義的會談。

第二：達賴喇嘛自己的講演和對外國媒體的講話也並不一致，一如前面所論，如果達賴喇嘛真正有心將西藏問題放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解決，則就完全沒有達賴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的問題，只有地方人士與中央領導人見面的問題，特別是在面對帝國主義問題時，也必須表現出某些中國的立場，例如今年也是江孜藏胞抗英百週年紀念的日子¹⁰，我們在西藏之頁的網站上，完全沒有此一消息，達賴喇嘛在面對自己先民勇敢抗英，而遭到英帝國主義殘酷地大量地屠殺，卻完全沒有一字一句的悼念之辭嗎？難道江孜抗英的藏胞不是藏族的祖先嗎？難得仁孜藏胞抗英的歷史也是中共偽作的嗎？難道那些藏胞不是爲了自己的家園和帝國主義奮戰嗎？如果達賴喇嘛只紀念自己的「抗暴 45 週年」，而不願紀念十三輩達賴喇嘛抗英所做的貢獻，那麼所謂的普世價值爲何？那又如何可以取信于中共，取信于在西藏的藏胞呢？

第三：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在針對中共治藏政策的攻擊常常錯誤¹¹，甚至是杜撰不實的攻擊¹²，完全不能針對中共幹部或是西藏地方的藏族幹部。在治藏的問題上，真正的問題來反省，而提出更好的建議，因此也就無法使中共在治藏政策上達到反省的效果，同時達賴喇嘛之流亡政府

⁹ 《西藏青年會：獨立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途徑》，西藏即時新聞，2004 年 5 月 25 日。

網址: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5/index.html#040525.2>

¹⁰ 拉薩，《紀念江孜宗山保衛戰 100 週年》，中國西藏信息中心，2004 年 8 月 24 日。

¹¹ 《約 200 萬黃魚被困泉吉河》，西藏之頁，2004 年 6 月 24 日。

網址: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6/index.html#040624.2>

¹² 《面臨從西藏消失的西藏糕瓦(普氏原羚)》，西藏之頁，2004 年 7 月 23 日。

網址: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7/index.html#040723.2>

《西藏生態之災—十萬中國挖草大軍》，西藏之頁，2004 年 7 月 15 日。

網址: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7/index.html#040715.1>

對中共所攻擊的事情也沒有太多的新意，不外是人權問題、宗教信仰、西藏文化、藏區生態，這些話題完全是以西方的標準美化為普世價值，對此中共早以有了馬列主義和中國特別的防禦盾牌，姑不論中共的自我辯護是否成理，但是已經成為一套自我應對的邏輯，所顛流亡組織這種的攻擊只能是一種自我滿足式的攻擊而已，對於真正改善西藏的人權、宗教、生態可以說毫無助益，反而是增加了雙方的仇恨，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如果真正希望中共與之會談，就必須從真正的事實出發，對中共的作為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所謂「同一的標準」是指如果達賴喇嘛此刻仍在管理西藏事務，而西藏面對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衝擊，以及藏胞希望立即改善生活的水平的要求時，統治者應該作出何種回應呢？在挑戰中共的西藏自治方面，如達瓦仁在提出「十七協議與民族自治」¹³乙文中，除了民主改革和十七條協議之第十一條的條約解釋不夠全面，對「一國兩制」¹⁴有誤解之外，第三段比較郭金龍(西藏區黨委書記)和熱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發跡背景來說明中共對藏胞不信任的說法，無論在駁斥中共或是在面對現在藏區的藏胞都是十分有說服力的說法。再以生態問題而論，事實上，達賴喇嘛流亡組織關心西藏生態，除了指責中共開發西藏的政治需要之外，更應該進一步付起教育藏胞提高環保意識，隨時隨地作環保，才能真正有利於西藏生態的改善，果如此就無需以攻擊、漫罵作為流亡組織宣傳的主要內容，又可以使世人真正感覺到達賴喇嘛和平解決問題的情懷和慈悲。

四、中共的策略：

事實上，由於中共自身在「改革開放」政策上所獲得的成績，創造了她自身在解決海外藏胞問題上相對有利的條件，因此只要達賴喇嘛的言語上和行動上，在達賴喇嘛的號召上和流亡組織的宣傳上不能一致的情況下，中共在因應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上將採取以下的幾種策略：

第一、拖延策略：中共是以政權的壽命和達賴喇嘛的生命來鬥爭，由於西藏是在中共掌權之中，因此中共政權可以採用拖延策略來形成一種自

¹³ 達瓦才仁，《十七條協議與民族自治》，西藏之頁，2004年8月17日。
網址：<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8/index.html#040817>

¹⁴ 「一國兩制」的精神在於對港、澳、台不實施社會主義制度，而十七條對西藏地方改造明定在十七條協議之中，所以西藏十七條與「一國兩制」完全無關。

已不急對方急的時間優勢，對海外藏胞而言，十四輩達賴喇嘛一旦圓寂，新的藏胞領袖是否仍有十四輩達賴喇嘛的智慧和魄力都是危機，一旦反抗力量欠缺一個中心服眾的領袖，對反抗事業的打擊必然不小，所以中共認定拖延戰略是有利的。

第二、發展策略：中共治藏的政策，客觀而論是在建設、在努力、在發展，生活在拉薩、日喀則、江孜、澤當、亞東的藏胞可能依然對中共的統治不滿意，但絕不是流亡組織所描述的那種仇恨，特別是藏族青年的變化，則是更加明顯，以經濟發展來攏落藏胞自然有其極限，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都還不可能，因此發展策略對中共治藏而言，仍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

第三、同化策略：中共在民族政策有二大重心：一是同化，一是團結，團結是同化的目的，同化是團結的基礎，而同化的途徑以往是意識形態，如今是經濟發展，達賴喇嘛和西方的援藏團體不斷對中共的同化進行攻擊，然而以現代化作為同化的途徑，不正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權最擅長的事嗎？他們這些攻擊對大部份在藏藏胞就沒有說服力，因為生活水準的提高是個人現實的利益，何況中共的同化已經注意到從單向而雙向，例如入藏幹部藏語化，選拔西藏的優秀青少年到內地就業、就學，當然流亡組織對此也攻擊甚勤，特別是青年入內地留學乙事，然而在達蘭莎拉的流亡組織，難道就不鼓勵當地的藏胞青年到英美求學嗎？這些去英美的藏族青年，在英美生活的藏族仍然和老一輩的藏胞一樣相信宗教嗎？現代化的趨勢原本對非現代化地區的人民具有一種吸引力，在藏西的藏族青、少年也自願接受現代化的薰陶，中共提供此一環境，我們可以說中共推行此一政策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共目的不是為了蓄意破壞，消滅藏族文化，至於在客觀上可能導致藏族某些價值和傳統的改變，這也是自然的事，最終西藏文化能保存下來的必然是經過現代化考驗和檢証的珍貴的遺產。

第四、開放策略：流亡組織應該注意到中共開放西藏的旅遊、觀光，使藏胞不斷與外面的觀光客接觸，外國人也不斷湧入西藏，其結果是藏人對外國人的思想、看法有了免疫力，外國人對西藏多了感性認識，因此流亡組織宣傳的真實性就很容易受到個別事實的檢証，同時中共政權也開始組織西藏文化的輸出，開始與歐盟與澳洲進行人權對話，這些開放措施都

會大大抵消流亡組織的宣傳，因此在開放政策上中共是佔盡了地利之便。

第五、包圍策略：中印關係的調整，中尼關係的強化，雖然都是中共和平崛起，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下的產物，是中共國家總體戰略的乙環，但是由於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寄居印度，尼泊爾又是藏人入藏的必經之道，因此中印、中尼關係的改善，在客觀上必然對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在印度處境產生客觀的不良影響，而且此一影響必然隨著渠等政權關係的改善而擴大，這自然就成為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必須面對的嚴肅的問題，中共手中有這幾種策略，他們又何必急著與達賴喇嘛會談呢？

中共所施行的以上五種策略，顯然具有一定的效果，雖然從流亡組織的宣傳品來看，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然而從世界、從國際、從中國大陸內部來看，恐怕不會有人認為目前的西藏問題是中共發展上嚴重的問題，這就可以部分說明了「西藏問題」在中共政權和在國際關係的份量。

五、結論：

然而中共也必須理解到他的政權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少，如果從技術官僚政治的本質來看，必須採取逐一解決，及早化解的對策，才能積累執政的合理性，而達賴喇嘛和海外藏包的問題雖然中共籌碼不少，但是在國際間來看，畢竟仍是中共的問題之一，而且達賴喇嘛的問題誠如達賴喇嘛所說這是中共形象工程之一，此一問題解決不僅是中共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的緩和，而且國家形象的提升，惟此來看，應該是趁達賴喇嘛仍然健在時尋找化解之道，才是明智之舉，是以當然在中共與海外藏人之間的矛盾，除了達賴喇嘛的努力之外，中共的努力更是不可或缺的，中共政權迄今為止只是簡單地、重覆地攻擊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是騙局，而未就達賴喇嘛的轉變深入加以研究，甚至可以運用達賴喇嘛提出的口號來要求海外藏胞，並且在大陸有必要使大陸藏胞真正了解達賴喇嘛的轉變，以證中共治藏政策基本原則的正確性，然而中共的作品不論是對內或是對外完全不理會達賴喇嘛的呼籲，事實上如果達賴喇嘛一直都是民族分離主義者，則中共中央為何在 2002 年 9 月、2003 年 5 月要接受達賴喇嘛私人代表訪問大陸呢？如果一面不斷攻擊達賴喇嘛，一面有限度允許達賴喇嘛代表的接觸，又如何讓海外藏人相信中共有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或是達賴喇嘛

問題的誠意呢？其次是中共既然以和平崛起自居，則和平的手段不然只是用在外交、用在鄰國的糾紛之外，尤其必須用在解決內部的糾紛，諸如西藏問題、維族問題、台灣問題，這才使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具有內外一致的精神，任何一個政權如果在內政方面，自以為在主權之下就可以至高無上、予取予求、以我為主，則必然是威權體制，如中共；如果是外交問題上，只知道以拳頭相向、唯我獨尊，則必然是霸權主義為小布希政府，而中國文化所講的王道精神，則是內外兼修，以德化為天下，這才真正是中國特色的精髓，也是中共和平崛起所必須遵行的道路。

《附件》

藏區旅行見聞

時間：2004 年 8 月 5 日~8 月 19 日

參訪人：楊開煌教授/東華大學公行所教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馬彥彬副教授/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地點：西寧、青藏公路、拉薩、日喀則、江孜、澤當

1999 年 6 月江澤民在西安提出「西部大開發」的國家戰略以來，三年多來(引用者按至 2003 年止)，中共陸續安排了一大批重大開發專案。建設項目大體可分為三大類：（1）立足西部、全國受益的項目。（2）改善西部基礎設施狀況的建設項目。（3）提高西部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項目。據統計，2000~2003 年三年間，西部共投入國債資金 1600 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 6000 多億元，專家預測，預計五年內將達到 1 萬億元。與此同時，國家在扶貧解困、財政轉移支付、稅收返還等方面向西部傾斜。由於投資的大幅度增加，西部地區 GDP 增長連年加速。2000 年增長 8.5%，2001 年增長 8.7%，2002 年增長 9.9%，四川達到 10.6%，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¹⁵。因此西部大開發的計劃，確實是對中國大陸擴大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拉力，中共在西部大開發中投資建設的五大標誌工程更是中共，企圖改變西部落後面貌的重中之重，

¹⁵ 資料來源：《審視西部大開發》<http://www.xslx.com/htm/jjlc/hgjj/2003-12-11-15654.htm>
發佈時間：2003-12-11 文章來源：作者供稿 文章作者：林凌 劉世慶

此五大工程爲生態環境建設：包括天然林禁伐、退耕還林還草、防沙治沙、天然草原恢復等，是爲防治長江洪澇、黃河斷流、北方地區沙塵暴的主要舉措，也是爲了進行全國性的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工程。西氣東輸：主要是把新疆、陝甘寧、青海、重慶、四川的天然氣輸往中部和東部，爲這些地區提供民用、發電、化工原料的氣源。西電東送：主要是開發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黃河上游的水電和陝西、山西、內蒙古的坑口煤電的輸出工程，以便爲大陸的南部、東部、中部、北部各省的更快發展提供清潔、廉價的能源，改善全國的能源結構和治理環境污染。青藏鐵路：完全建在西部，首先對西藏的開發建設及交通運輸有重要意義；但更爲重要的，是爲加強全國的民族團結、建設西部邊疆和鞏固國防提供重要保障。南水北調：更是關係全國大局的工程。工程的西線涉及雅礱江、大渡河、通天河等幾條長江上游的重要江河。在這些江河上，既要建設電站、承擔向東部提供電力的任務，又要承擔向黃河輸水、解決西北缺水的責任¹⁶。而以藏人生活的地區來看，生態環境和青藏鐵路是最重要的，此次在藏人生活地區實際的造訪，也對生態保護和青藏線的印象最爲深刻。

從生態報保護而言：總得印象是官熱民冷，官方的環保政策、法令相對完備，但藏民的環保意識並不到位，此處的官方主要是以西藏地方官員，還有在青藏鐵路線上施工的工程人員，例如以青藏鐵路的路線必須穿越青藏高原，從而有可能阻害到高原野生動物的遷移，因此在築路時，加設了許多旱地橋墩，將鐵路抬高了五、六米高，以便動物可以在橋下自由通行，是以未來的旅客有可能在車廂欣賞到野生犛牛、羚羊壯觀穿越的神奇場面；又如青藏路的車廂設計爲全封閉式加壓的車廂，既有舒適清潔的效果，也使得使用的乘客不能將垃圾外擲，除此之外，我們也注意到中共在青藏高原普遍重植防沙林帶，既保水土兼具治沙功能，對藏羚羊的保護，不僅禁獵，在海關嚴守，而且設置專門警力，配合義工，設立哨所、哨站，認真保護等等都很令人感動，然而也就在青藏公路上我們則常常也看到從前車拋出的垃圾，在各中途站的附近以及河邊岸上，更是垃圾滿地，令人不忍猝睹，在河邊向遊人乞討食物的藏童，也同樣在食物用完之後，塑膠袋盒就隨地拋棄，當然大量的垃圾還是來自外地的遊客，有不少

¹⁶ 同註 1

的山羊、犏牛就在垃圾邊上覓食，我們不難想像有多少垃圾會進入動物的胃腸之中，對他們構成致命的傷害，在拉薩、日喀則等城市中，也是垃圾處處，因此在生態環保的問題、個人清潔衛生的問題，決不是法令規範或政策寬嚴或官方努力的問題，而是全民意識的問題，生活習性改造的問題，此一工程的浩大，如果不為藏民所認識，則環保的努力有可能付之東流。

從青藏建設而看：這是西藏地區的第一條鐵路，也是標誌著大陸所有省區均能通行鐵路的工程，對大陸、對西藏均是極具意義的工程，而其中最難的工程在於凍土層的施工問題，凍土層的困擾在於冬季土質堅硬無比，可以是很好的路基，一旦夏季冰雪融入土質鬆軟，即成泥淖，牛羊穿過均視為畏途，是在施工一大技術的難題，大陸工程人員除了以鋼板、灌漿等傳統施工方法之外，主要以太陽能極棒導熱深入地下，利用太陽能的調節，以使地下凍土保持常溫，不受外在天氣的影響，以使路基穩定的施工方法來克服此一問題，一旦青藏鐵路的施工完成，有可能成為全球其他地區在建築施工上的一大突破，除此之外，基樁擴張術的施工也大大增強了橋墩基樁的穩定性，這些都是青藏鐵路上的特點，相比之下高原鐵橋，數十米橋墩，則主要只是表現其雄偉和氣勢，真正的技術和技巧，反而是在地下視而不見的地方，這是第一印象，此外青藏鐵路的完成對於輸藏物質上也是一大突破，目前西藏地區不論是民用、軍需的活用品均來自公路，不但費時、危險、不確定因素太高，而且數量有限，價格昂貴，西藏的貨物也無法外送，一旦鐵路通車則運量必將大大提高藏人生活水平與內地人民的拉近，也就可以成為可以期待的目標，因此青藏與內地的一體化也會因為青藏鐵路的完成而縮小了大陸內地的空間、時間的距離，也就有助於縮短青藏與內地心理上、文化上、價值觀念上的距離。同時對中共政權也具有鞏固西南邊陲，放眼南亞安全等重要戰略意義的重大工程。目前青藏鐵路在格爾木到沱沱河段已經竣工，也在貨運上開始利用，拉薩到那曲段也在趕工之中，那曲到沱沱河段也在施工，預計 2007 年可以完成，不過當地的居民都希望施工的鐵路單位可以趕工，以便儘早完成入藏的運輸大動脈，足見藏人盼路之情。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人把地種好，地把人餵飽。（維吾爾族）

火煙不出屋，場上別晒穀。（黎族）

早霧晴，晚霧雨。（白族）

螞蟻出洞，小雨不停；長蟲出洞暴雨淋淋。（彝族）

兩人相好，六年嫌短；兩人不合，六年嫌長。（侗族）

相愛才交友，合意才聯親。（水族）

不作異鄉人，不知故土親。（維吾族）

馬馳千里，總想著群體；人走千里，總想著故里。（哈薩克族）

人老思鄉，人老思林。（藏族）

山是柯爾克孜人的父親，水是柯爾克孜人的母親。（柯爾克孜族）

秋天不積草，來年無春羔。（蒙古族）

拿弓的人忘不了箭，騎馬的人丟不了鞍。（滿族）

勤堵水有魚吃，勤種田有飯吃。（傣族）

男兒莫閑坐，少女少串門。（回族）

不出力鋤，怎挖得根。（瑤族）

一年辛苦，年幸福；前人辛苦，後人幸福。（壯族）

人不學落後，刀不磨生鏽。（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蒙古時局與周邊關係

吳楚克

（法學博士，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邊疆政治學博士後）

摘要

本文從蒙古與中、俄兩國的特殊關係及原因、蒙古在冷戰中及冷戰後的獨特影響，以及蒙古在未來東亞穩定中將起到的作用，進行歷史的政治戰略分析。文章認為，在今後西方“遏制”中國、繼續“削弱和監視”俄羅斯的戰略中，爭奪蒙古將是不可避免的，而蒙古也將會在其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因素影響下做出選擇。

關鍵詞：蒙古、東亞、作用

壹、

蒙古位於中國正北面，面積 156.6 萬平方公里，比內蒙古大 38.3 萬平方公里，人口 238.7 萬，是內蒙古的 1/4 左口。蒙古與中國有 4677 公里長的邊境線。蒙古資源豐富，其中品位較高的 45 種礦產儲量的潛在價值僅次於俄羅斯和美國，居第三位，石油、天然氣、金、鈾、銅五大礦藏的儲量居世界前 10 位。蒙古原稱外蒙古，曾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是蒙古族的發源地。元朝時蒙古地區被稱為嶺北行省，17 世紀末，整個蒙古歸順了清朝。當時的蒙古地區包括今天蒙古、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唐努烏梁海和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1924 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1992 年改名為蒙古。直到清末，蒙古社會內部依然保持著自身的特殊性，中央政府對外蒙古的統治制度也不同于內地。

第一，清代蒙古依然保持著游牧式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獨特性突出表現在每一個游牧生產者並不具體占有固定的小塊土地，而是屬於

一個相對固定的部族或族群，在部族或族群內部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關係，但由於土地個體經營化對游牧生產方式並不適應，從而由此構成的蒙古社會內部的封建關係並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綱常倫理結構，而是一個以部族族群為核心的部落首領式的封建社會。因此，它的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淡薄，部族關係就起到決定性作用，世襲貴族階級是蒙古社會的統治階級。

第二，游牧生產創造的物質財富是有限的，因而社會財富的積累也是十分有限的，它從物質方面決定了蒙古游牧社會與內地的密切關係。當這種經濟關係受到內部封鎖，又不能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經濟侵入，必然出現經濟上的“離心”傾向。而清末對蒙地的“放墾”又加劇了這種“離心”，因為，牲畜是游牧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勞動對象同時又是生活本身，生產資料和生產力之間的這種直接關係，是蒙古社會要求保持、占有和不斷擴大草場的根本原因。

第三，生產方式決定了蒙古民族在思維方式和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獨特性，一方面是崇尚自由、浪漫和英雄主義，使豪邁的、超自然的，誇張的英雄史詩和傳說成為他們精神思想的武庫；另一方面是崇尚自然、真實和人本主義，把生命與情感、死亡與自然輪迴、人的世界與自然界當作一個整體。因此，他們精神世界當中只有“天”才是永恒的，沒有“鐵打的江山”或“永遠的皇帝”，成吉思汗就告誡他的兒子們不要相信“百代的皇帝”。他們對統治者變更的頻率和運動抱有一種“天然的革命性”。

明清兩代統治者都把維護蒙古統治集團的利益與維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作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來考慮，特別是清朝統治者把蒙古地區作為一個特別區域加以封閉。這種封閉政策並沒有引起當時蒙古各界的反對，因為，保護游牧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最重要的就是保護游牧地，而保護統治者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也是封閉蒙古社會與外界的聯繫。所以，盡管從清末開始到北洋軍閥，再到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都力圖消除蒙古的這種特殊地理和邊疆政治制度，以便將它納入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中，但都遭到來自蒙古社會，特別是王公貴族階層的反對。究其原因，與蒙古封建社會制度的特殊性造成它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長期的特殊地位有密切關係，它培養了一種相對特殊的社會群體意識：那些屬於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方面的

因素成為蒙古民眾普遍反對“招民放墾”的社會原因，而擔心失去特殊地位帶來的統治權利則是統治階層反對“設省置縣”的根本原因。

從外部原因來看，外蒙古獨立的主要原因是沙俄長期對外蒙古王公上層實行拉攏，竭力促使其從中國分裂出去，辛亥革命後，沙俄直接導演了外蒙古獨立。在北洋政府與外蒙古當局僵持階段，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外蒙古獨立不但失去了沙俄的支持，而且外蒙古宗教和世俗統治集團更懼怕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性質，所以在取得一定保證後準備取消“獨立”。此時，北洋政府認為沙皇政府倒台，外蒙古危機已根本消除，不需要再和哲布尊丹巴談什麼條件，派遣軍閥徐樹錚統領大軍進入庫倫，以武力解決了外蒙古獨立問題，先前的許願變成廢紙。這樣的結果不但使開始覺醒的外蒙古民眾感到自治無望，就是一些反對脫離中國的王公貴族也失去了反對的理由，整個外蒙古比宣布獨立前孕育著更大的分裂因素。

沒有沙皇政府對哲布尊丹巴反動統治集團的支持，外蒙古不可能借辛亥革命搞獨立自治，同樣，沒有蘇俄政府的支援，蒙古人民革命黨也不會取得政權並建立國家。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為外蒙古獨立創造了歷史時機。

貳、

由於沙俄及後來的蘇聯在外蒙古獨立事件上的作用，使蒙古與中國關係處在一個十分敏感的境地，因此，蒙古在冷戰過程中的中蘇關係問題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影響，我們可以把這種影響作用發生、發展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 1949 年到 1961 年。應該說，發生於歐洲的冷戰鐵幕還沒有遮蓋到中蘇蒙三國關係上。儘管有歷史上的宗藩關係，但出於共同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中蒙兩國關係自 1949 年 10 月 16 日建交起到 60 年代初，處在良好發展狀態。1952 年 9 月，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議會主席澤登巴爾訪問中國，中蒙雙方簽了經濟文化合作協定。1953 年起，中蒙蘇三國合作修建從中國內蒙古經蒙古通向蘇聯的鐵路。1954 年 7 月，周來總理應邀訪問蒙古，同年 9 月桑布主席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團來中國參加國慶並訪問。以後，中蒙兩黨、兩國政府領導人曾多次互訪，並

簽訂了一系列重要條約和協定。

然而，與蘇聯的關係相比，蒙古更緊跟社會主義的“老大哥”。這其中的原因：一是從精神深處外蒙古依然對中國懷有“弱小離異者”的心態，總是希望劃清界線。二是出於從蘇聯得到軍事支持和經濟援助的需要。三是出於對蘇聯領導人支持外蒙古獨立問題的感激。這些原因決定了蒙古在相當長時期對中國存有戒心，對蘇聯則採取一種完全追隨的從屬態度，這也預示著中蘇關係破裂後，蒙古採取全力支持蘇聯的立場。

第二階段，從 1962 年到 1982 年。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游離於外，成為冷戰關係中的另一極。蘇聯的全方位戰略，促使它在世界各處與美國展開較量，也加劇了中蘇關係的對抗程度。外蒙古追隨蘇聯公開反華，中蒙兩黨關係迅速惡化，兩國關係走上了曲折鬥爭的發展道路。1963 年 12 月，蒙古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了反華決議，蘇聯軍隊開始進駐蒙古，威脅中國安全，從而使兩國關係遭到嚴重破壞。1964 年 10 月，蘇聯主要領導人更換，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後領導人，不但繼續大量增兵中蘇邊境，而且增加駐紮在外蒙古的軍隊，以控制蒙古並利用蒙古對抗中國。1966 年 1 月，蘇蒙兩國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為期 20 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允許蘇聯在蒙古設置軍事基地並長期駐紮軍隊，從而對中國北部邊疆構成嚴重威脅。從 1967 年 1 月起，蒙古不再處理赴蒙執行經濟任務的中國職工入境簽證，使兩國關係完全陷入停頓狀態。1979 年 2 月，在中國對越進行自衛反擊戰中，蒙古站在蘇聯、越南立場上，對中國進行無理指責，同時，蒙古驅趕、迫害中國僑民與中國駐蒙使館外交人員的事件屢有發生。

第三階段，從 1983 年到 2000 年。20 世紀 80 年代初，冷戰中的東方陣營開始發生改變，首先從蘇聯內部發出了“民主化、公開性”的信號，東歐衛星國家，特別是波蘭開始出現強烈的擺脫蘇聯控制、取消共產黨執政的浪潮。到 80 年代中期，這一潮流開始影響到蒙古，在蒙古內部也出現了一種類似東歐國家反對蘇聯駐軍的呼聲，“兄弟般”的支持變成了使蒙古經濟不發達的主要原因，軍事基地和龐大的駐軍成為蘇聯變相掠奪蒙古資源的借口。蘇聯在這種情況下調整了對外政策，並從蒙古撤走了大部分針對中國的駐軍。中國也適應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也逐步調整了對

蘇、蒙的有關政策，蒙古隨即改變了過去公開反華的態度，積極發展對華關係，從而使中蒙關係進入了一個全面改善的發展的時期。

在蘇聯開始從蒙古撤軍和減少對蒙古的援助後，由於蒙古經濟結構存在嚴重的不平衡，國內日常生產和物資需求發生困難，惟一能迅速而又經濟地解決困難的途徑就是發展與中國的邊境貿易，而內蒙古與外蒙古在民族和語言上的天然聯繫，使中蒙關係更多地以民間方式表現出來，並迅速超過與蘇聯的貿易，1989 年兩國關係正式實現正常化，1990 年蒙古大呼拉爾主席奧其爾巴特首先訪問中國，表明蒙古正在改變過去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同年 7 月，關閉了 30 年的蒙古駐呼和浩特總領事館正式恢復，重新建立起兩國關係的重要橋樑。1991 年 8 月，楊尚昆主席對蒙古的首次訪問，雙方簽署了關於蒙古通過中國領土出入海洋和過境運輸的協定、關於中國向蒙古提供貸款的協定等一系列有關經濟合作協定。1992 年 5 月，蒙古總理賓巴蘇倫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 30 年來蒙古總理首次訪華，雙方簽署了政府經濟合作協定、提供貸款協定、兩國政府汽車運輸實施細則和植物檢疫協定、兩國在共同邊境線上開辟 8 對常年性和季節性邊境公路口岸，兩國貿易方式也由過去的記帳式改為現匯貿易或易貨貿易。1993 年，中蒙貿易額占蒙古對外貿易總額的 1/4。

1998 年 12 月，蒙古總統巴嘎班迪訪華，1999 年 7 月江澤民主席訪蒙。1999 年，兩國貿易額達到 2.67 億，比 1998 年增長 51%，成為蒙古第一大貿易伙伴。到 2000 年，中國在蒙註冊的公司有 400 多家，投資額 1.2 億美元，占外國對蒙投資的 40%，是蒙古最大的投資國。但是，中國在蒙古投資的社會影響不大，主要原因，一是投資項目的選擇上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影響。二是對投資後效益的監督不力，或沒有監督調查，投資完就算全部完了。三是民間投資只注意短期效益，不注意長期合作，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方面政策性不強。

總之，20 世紀 70 年代，中、蘇、美三角關係中，蒙古成為蘇聯對抗中國的“前哨”陣地，這個確是外蒙古獨立之初根本無法想像的。如果不是幾十年前還曾經是同一個國家的歷史，這種切膚之痛似乎還是輕微的；如果沒有蒙古民族一分兩邊的現狀，也許會更好理解這種“主義加兄弟”反目的因由。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類似的情景並不是唯一的，除了

歷史的經驗教訓外，改變貧弱和落後，把自己建設成為富強民主的現代化強國，恐怕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民族的聯繫畢竟超越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關係，這種關係到 21 世紀，蒙古又一次面臨處於它曾經處於的位置上。

參、

21 世紀開始，以小布什為首的美國全球戰略逐步發生實質性變化，退出反導條約，建立導彈防衛系統，確立全球反恐陣線。在徹底擊潰俄羅斯的大國欲望後，俄羅斯採取更為實際的對外政策。而美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以台灣問題來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同時與俄羅斯和中國爭奪對中亞與東亞的影響力。加強對蒙古的影響，使其成為西方大國安插在俄、中之間的“楔子”，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長遠目標。

“911”以後，美國國家戰略防禦體系除了加強本土防禦外，突出強調事先打擊所謂“邪惡國家”的理念。最近美國國家戰略安全委員會發表咨文，編造更嚇人的“中國威脅論”，這種險惡用心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西方國家在蒙古的“投入”。目前，主要表現為：一是美蒙關係日近，特別是在軍事合作方面，聯合軍事演習、軍事裝備改進、人員訓練，美方是不借工本。二是日蒙經濟合作加強，日本放長線，著眼未來在蒙古的影響。三是德國、韓國相繼關注蒙古市場，加強經濟政治文化合作。四是蒙古的一些輿論開始傾向西方敵視中國的宣傳。蒙古又處在了西方遏制中國的爭奪旋渦中。

美國前國務卿貝克認為，蒙古本來是個人口少、經濟落後的亞洲內陸小國，但因其位於中國和俄羅斯之間而“身價百倍”。美國蘭德公司的專家認為，今日蒙古是個失群的“羔羊”，要盡快拉過來，“好好餵養”，會變成“頭羊”，能引導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上民主之路。2000 年 11 月 17 日，美國駐蒙古國新任大使約翰·丁格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常設委員會任命聽證會上發表演說時講：“在東北亞的民主化過程中蒙古具有戰略意義，蒙古以它同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而具有值得稱讚的特殊意義。美國對蒙古的主要興趣在於對它對民主化、市場化給予支持。”主要表現在：

一是美國慷慨地給予蒙古長期最惠國待遇，並接納蒙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予蒙古各方面無償援助。幫助蒙古在東巴彥地區打出蒙古國內第一口油井。據悉，該油區與中國二連浩特油田屬同一個油層，東巴彥油區的開採，表明蒙古開始與中亞爭奪該地區的地下油層。美國還幫助蒙古建成了蒙古國內第一家純銅冶煉廠，改變了以往蒙古把礦石運往國外加工的歷史。

二是蒙美軍事合作從 2000 年開始快速發展。蒙古人民革命黨在議會大選中獲勝不久，美國負責國防政策的副部長斯洛科姆訪蒙，同蒙古總統及新當選的總理、外長、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和其他要員會晤。他一邊試探蒙古新政權的政策走向，一邊不斷表示：“蒙古只要不從民主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後退，美國將不斷提供軍事援助，增加軍援經費，保持經常性的安全對話機制，建立兩國國防部長每年舉行會晤的新機制，全面擴大軍事合作與交流。”2000 年 8 月，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布萊爾上將訪蒙，與蒙方討論落實《2001-2007 年美蒙長期軍事合作協議》和新的軍事合作項目。2001 年 2 月，美國駐蒙古大使丁格爾會見蒙古國防部副部長並遞交了美國支持蒙古參加國際維和行動的正式批文。美國政府決定為支持蒙軍參加維和行動提高摩步營的訓練水平，將提供 35 萬美元的軍援。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據蒙古的要求，美國總統布什已經批准向國會遞交了 2001-2002 年向蒙古無償提供一批武器裝備，並允諾全部費用由美方承擔的議案。該議案的落實將使蒙古盼望已久的“依靠美國裝備更新蒙軍的武器”如願以償。

三是軍事合作從武器裝備向戰略目標和全面安全合作發展。蒙美兩軍頻繁交往和密切合作已表明雙方的軍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兩國軍事安全合作已全面鋪開。兩軍合作上，不僅有短期（年度）合作項目，而且有長期合作協議；不僅蒙美兩軍加強雙邊合作，還要關注亞太、中亞和東北亞多邊的安全問題。美對蒙軍援上，不僅提供加強邊防設備的資金，而且無償提供武器裝備，還要為蒙培訓軍事指揮員；不僅幫助蒙古在其本土上進行軍事演習，而且資助其參加聯合國軍事演習和國際維和行動。無庸置疑，蒙美軍事合作已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軸，蒙方雖然不公開提視美國為“第三鄰國”的戰略，但雙方的實際操作已比第三鄰國更靠近了

一步。美國在蒙古的軍事存在無疑對中國的安全產生挑戰和壓力。美國以中國為潛在對手的軍事戰略重點向亞太轉移的態勢，美國的亞太戰略部署是把蒙古當作“楔子”。

四是其他西方勢力還從政治、文化上對蒙古加緊滲透。在政治上，大力支持民主黨派，現蒙古社會上有150多個政治黨派和組織，其中主要的幾個大黨結成蒙古民主陣線和蒙古復興黨，成為一支能與蒙古人民革命黨抗衡的政治力量，並千方百計出謀策劃，對這些民主黨派給予物質和輿論上的大力支持，而這些民主黨派與達賴集團、台灣等極右勢力頻繁接觸。在文化上，西方國家極力擴大他們在蒙古的影響，近年來，美國、英國不斷向蒙古派遣和平隊，日本也派出青年協力隊。美國幫助蒙古在東部地區建立一個草原定位站，英國出資研究蒙古高原的環境變化對蒙古傳統文化的影響。

五是日本極力擠進蒙古市場，妄圖從經濟上顯示對東亞事務的主導，日本外務省官員說：眼下蒙古是一塊空白之地，對我們來說是個機遇。日本利用蒙古的經濟困難，以日元為敲門磚，從1991年開始召開了世界援蒙國家會議，日本的援助額超過了各國援蒙總額的1/3，是援蒙的最大施主。1996年，日本援建的蒙古兒童教育中心竣工。日本派專家攜帶大批精密探測器，聲稱要幫助蒙古尋找成吉思汗的“墓地”，並要建立具有世界意義的旅遊觀點。今天，日本已經贏得了蒙古人的極大好感，成為在蒙古最受歡迎的國家。

六是俄羅斯在國內政治經濟狀況略有改善後，即加強恢復與蒙古的傳統關係，特別是經濟貿易往來發展迅速。一個最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是2000年到2002年中、俄對蒙麵粉出口的變化。在此以前，中國一直是蒙古食品和日用品的最大出口國，2000年占麵粉進口量的54.2%，俄羅斯是39.9%，到2002年，中俄雙方的市場份額變成了22.6%和64%。當然，中國麵粉的質量和蒙方給予俄羅斯麵粉低於中國10%的進口稅是導致市場變化的主要原因，但俄羅斯加強對蒙古貿易的力量可見一斑。俄羅斯意識到爭奪蒙古的重要影響。

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安全戰略中，中國和俄羅斯無疑是最具有挑選性的。目前看，中國和俄國單獨一方沒有與美國抗衡的實力，但它們都是未

來世界均勢中最具有影響的國家之一，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結成聯盟，將會對美國主導的“一極”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如何分化這兩個大國之間可能出現的合作傾向，如何窺視這兩個大國的動向防範它們之間的直接合作，都是十分有利於美國利益的。這就是蒙古地位重要性的原因。眼下，蒙古除了貧弱的國力之外，國內政治動蕩和嚴重的政府腐敗也造成這個內陸國家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發展，更難以實現真正的“民主化”。而且目前的所謂民主化狀態，只能使國家成為一盤散沙，為各方勢力進入打下良好的基礎。

肆、

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儘管表面上並沒有與蒙古發生直接關係，但蒙古的政治傾向性直接影響中、俄的安全與穩定，並因此削弱中、俄在解決朝鮮半島危機和保持局勢穩定的作用。

蒙古在朝鮮難民問題上與韓國達成協議，允許朝鮮越境者以難民身分進入蒙古。所以，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以來，通過中蒙邊界進入蒙古的朝鮮越界者呈上升趨勢，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影響。近年雖有所好轉，但從中朝邊境到中蒙邊境，交通發達，線長面多，如果出現朝鮮越界者大批湧入，對中國東北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關係都是極其嚴重的。

目前，隨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中國東北地區社會穩定的影響也潛在地存在，東北地形呈彎狀，寬度相對嫌窄，彎狀內側就是俄羅斯和蒙古。所以蒙古與朝鮮的直線距離並不遠，在戰略上，蒙古的傾向勢必會影響到朝鮮局勢。這一點通過蒙古與韓國之間的合作就可以看出來。如果蒙古逐步轉變為西方勢力的“忠實”盟友，必將成為影響東亞安全與穩定的舉足輕重的因素，也將會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改變產生間接的“參照”式的影響。

蒙古對中國北部邊疆穩定的影響，將間接影響到台海局勢的發展。中蒙兩國邊界問題已經解決，兩國貿易也在快速增長，兩國領導人對雙方關係的重要性都又有相同的認識。而且蒙古近年開始認識到，與跨越海洋進行貿易和獲得援助相比，中國是它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因為，交通運輸成本決定了資源的成本，中國目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引子”，離開中國，

捨近求遠，不符合基本的商業規則。所以蒙古開始重視中蒙之間的全面合作。

但是，在西方勢力的干擾下，一旦台海局勢發生動蕩，問題就有朝不利於中國方面發展的可能。一是因為西方政治經濟勢力在蒙古的影響增加，其中也有企圖遏制中國發展的反華勢力。二是蒙古國內政治勢力中追隨西方敵對中國的少數人也會應和。2004 年台灣駐蒙辦事處開設，從一定意義上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台灣方面歷來不承認蒙古現狀，但陳水扁上台以來，企圖利用外蒙古走向獨立的歷史，為台獨尋找歷史根據，這也促使他丟掉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改善與蒙古關係。這不能不引起中國的警惕。

毫無疑問，蒙古在未來中、俄、美大國關係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並潛在幾種發展趨勢：

一種是倒向西方。從政治意識上徹底轉向西方式的私有制和個人民主精神，與中國現存政治意識發生矛盾，由此成為西方分化、西化、演變、監控中國的前哨。

一種是維持現有關係。幾方面都採取對等政策，相互依靠，利用各種矛盾為本國爭取實際利益。

一種是以經濟聯繫為主要條件，繼續加強和發展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保持兩國正常關係的發展。這幾種趨勢的決定因素是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都存在成為主流的可能性。

蒙古與中國有著最長的陸路邊界，蒙古族作為跨國界民族，分別居住在中、俄、蒙三國境內，因此，蒙古與中國保持和發展相互關係，是完全符合兩國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也為建立良好關係打下基礎。這就要求中國從經濟政治角度防止蒙古成為西方插入中俄間的楔子，演變成為西方遏制中國的橋頭堡。

（2005 年 1 月 19 日投稿，2 月 1 日審查通過）

女真東北面登場的朝鮮太祖李成桂研究

王永一¹

摘要

由於李成桂家族世居東北面，與當地的女真族有著良好的關係，所以，女真族是李成桂在朝鮮王朝建國過程中，最強大的後援勢力，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尤其是女真族的酋長，以及具有朝鮮王朝三功臣最高殊榮的李之蘭，是李成桂在朝鮮王朝建國過程當中與建國登基之後的最得力的助手，因而東北面成為朝鮮王朝建國肇基之地，所以，從李成桂登場開始，便與女真族維持十分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東北面、李成桂、朝鮮與女真、李成桂與女真

一、緒論

從女真族世居東北面而登場的李成桂，在高麗王朝時期，其家族便由祖先從朝鮮半島南部，北上移居到東北面，落地生根，並且陸續地受到元朝與高麗政府之命，負責掌管當地女真族，開始融入了女真族社會當中，而與女真族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到了李成桂即將登場時代，就是元明政權交替的時期。此時高麗王朝的內政與外交也受到極大的考驗，李成桂以此國內外情勢的劇變，善用其家族勢力即女真族，來進行東征西伐，攘外安

¹ 本人為韓國高麗大學校文學博士，韓國史專攻，韓中關係史研究。現為屏東慈惠護專專任助理教授，教授中國史通識課程。並為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與韓國高麗大學校中國學研究所合作之『中韓研究計畫案』之協同教授。

內。因而在其無心之下，經由威化島回軍的事件之後，順理成章地建立朝鮮王朝，所以在此建國過程當中，李成桂一直是依靠著東北面女真族為其家族的軍士基盤。

由此可知，東北面女真族是李成桂建國最主要的後援勢力，其中特別是女真族的大酋長，而且對朝鮮王朝建國具有大的貢獻，同時對朝鮮與女真族、明朝等三者的外交關係方面，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李之蘭是最值得注意的。以下就針對從李成桂登場背景下的麗末政情與東北面情勢、李成桂正式登場下的威化島回軍事件、李成桂一派的掌權與女真情勢、李成桂的東北面女真勢力與對東北面的治理、李成桂的最佳助手女真人李之蘭等課題來進行探討。

二、李成桂登場背景下的麗末政情與東北面情勢

高麗末期相當於東亞歷史上的一大轉換的時期。即進入十四世紀時，中國大陸正處在元明政權交替的時期，而隨著形勢變動的恭愍王時代，也開始遭遇到變化。恭愍王 3 年（1354），高麗對元朝的政策發生了變動。即恭愍王對外的手段是採取反元親明政策，對內則是要脫離附元之權門勢族的抑壓，致力於國權自主性的恢復和王權強化。首先在恭愍王 5 年（1356），誅滅了附元份子奇氏一族，²並且停止使用元朝的年號，同時撤廢了元朝在東北面舊疆的統治制度，即雙城總管府之後，收復了鐵嶺以北的失地。³而且也廢除了征東行省理問所，恢復高麗舊有官制。對於也是新成立的國家，即明朝，所採取的態度則是以「親明政策」為原則。⁴如此政治改革的執行結果，麗、元、明的三角關係是頗具微妙而複雜的。

在中國大陸形勢變動的餘波下，高麗則受到中國紅巾賊的大規模入侵，使得在恭愍王 8 年與 10 年（1359-1361）這兩次計劃將要中興麗朝的恭愍王遭遇到了挫折。而且更甚的困境是倭寇來犯是十分頻繁而猖獗。

² 閔賢九，《恭愍王代對"誅奇轍功臣"的檢討》，《李基白古稀紀念，韓國史學論叢》，SEOUL：一潮閣，1994。

³ 高宗 45 年（1258）12 月，高麗東北邊境地方，即設置在和州（永興），由蒙古官設的雙城總管府設置。參見方東仁，〈雙城總管府（上）〉，《關東史學》，第 1 輯，1982。

⁴ 《高麗史》世家，卷 41，恭愍王 17 年 11 月：「遣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王（朱元璋），吳王禮待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慰。」

由於高麗遭到倭寇長達四十年的侵略，全國各地均受到莫大的災害，這也是造成麗末社會矛盾的重要原因。⁵

總之，麗末恭愍王時期的情勢是：對內而言，政治腐敗，制度紊亂，權臣跋扈等；對外而言，在元明政權交替期的對元關係中產生了許多弊端，同時還有紅巾賊、倭寇的禍害等多重的內憂外患，如同處於艱困的命運之中。恭愍王在如此困境裡，雖然致力於復舊的中興政治，但是在其末年錄用了辛旽成為國王，試圖創造新政治的決心，其結果是矛盾的，反而促使社會變得更加混濁。⁶恭愍王被弑害後，⁷擁護幼主示禹王的李仁任與崔瑩等於是便主導了國家政權。這群政客心態一變，斷絕了與明朝的關係，而想要再次恢復與北元的關係。於是，在麗末政治界，出現了所謂「事元向明」不一的兩個派系，造成了衝突對立的局面。⁸

三、李成桂正式登場下的威化島回軍事件

在示禹王初期，李仁任一派的專橫甚為嚴重，之後被李成桂奏斬而死。然後再經由「威化島回軍」事件的契機之下，李成桂得以掌握了國家實權。此次的回軍事件可說是意味著新舊勢力的交替，而李成桂勢力因而擡頭了。

在遼東情勢方面，最重要的是鐵嶺衛設置問題了。示禹王 14 年（1388）時，明朝認為在高麗末期時，以位於遼東鐵嶺以北原來是元朝所管轄的領土為由，而主張直接領有鐵嶺，通知了高麗政府，欲設置鐵嶺衛一事。⁹對此，高麗政府相當重視此重大的問題，認為在恭愍王時期好不容易收復的鐵嶺以北的領土，絕不可交付於明朝。於是高麗大臣崔瑩計劃將要與明朝做一番實力對決，主張征伐明朝，以便阻止明朝取得遼東地區之後，做為前進高麗的基地，因此以軍事武力來排除明朝的施壓。可是以

⁵ 羅鍾宇，〈高麗末期的麗日關係-以倭寇為中心〉，《全北史學》，第 4 輯，1980。

⁶ 閔賢九，〈辛旽的政權及其政治的性格（上）〉，《歷史學報》，第 38 輯，1968

⁷ 洪武（1374）7 年 9 月，恭愍王被崔萬生，洪倫弑害。參照李丙燾，《韓國史》，中世篇，震檀學會，SEOUL：乙酉文化社，1961。

⁸ 事元派—以李仁任為首。即舊貴族派或保守派；事明派—以李成桂為代表。即新貴族派或新進派。

⁹ 《高麗史節要》卷 33，示禹王 14 年 1 月。

軍人出身的李成桂則對此表示反對，他以多年的軍事實戰經驗而提出所謂攻遼「四大不可論」，而反對進攻遼東地區。¹⁰雖然示禺王與崔瑩執意強行征伐，使得李成桂在不得已之下領軍征討，但是李成桂出兵反對的立場依然是不變的。¹¹其後，雖然李成桂曾經多次向示禺王請求班師回朝之建議，但是示禺王與崔瑩仍然不為所動，反而變本加厲地命令李成桂 必須增兵速攻，而拒絕李成桂的要求，於是李成桂衡量軍情將不利於高麗，而斷然地從威化島撤軍回到李成桂的東北面故鄉。因此，示禺王與崔瑩攻遼的企圖心失敗了。由此可知，李成桂對攻遼「四大不可」的主張是極其堅持的，而且自認是符合當時的狀況。¹²

由於李成桂的威化島回軍使得麗末情勢為之一變。即抗拒回軍的崔瑩被逮捕流放，示禺王則被放逐到江華島。所以史稱為「戊辰回軍」或是「威化島回軍」事件。韓國史學家們也稱「威化島回軍」事件為高麗沒落的第一步。¹³因此，由於李成桂受到農民與軍人，還有改革維新等人士的廣範支持，而進一步地獲得了國家政治與軍事實權。因此，握有實權的李成桂便對明朝表示善意的態度，結果，明朝也做出善意的回應，即聲明放棄設置鐵嶺衛的計劃。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逐漸緩和了。

四、李成桂一派的掌權與女真情勢

李成桂成功地從威化島回軍之後，示禺王被廢位了，他的兒子昌登上王位。因為昌王當時只有 19 歲，李仁任和他有姻親關係之故，而且曹敏修是因李仁任的推薦而活躍於政界的人物，所以李仁任鞏固了他自己的地位之後，便擁立了昌王。可是對如此的王位繼承方式而抱持不滿的李成桂，讓趙浚上疏私田改革的方案，¹⁴但是對此反對的曹敏修則被除去而遭

¹⁰ 《高麗史》列傳，卷 50，示禺王 14 年 4 月：「一曰以小事大。二曰夏月發兵。三曰舉國遠征，倭乘其虛。四曰時方暑雨，弩弓解膠，大軍疾疫。」

¹¹ 李成桂任右軍都統使・鄭池・池勇奇・裴克廉・李豆蘭・李元桂等諸將被隸屬於李成桂軍陣中。

¹² 李成桂攻遼「四大不可」內容之中，尤以「以小事大」一項，是為日後朝鮮對明關係之中，最重要的依據，即以小國（朝鮮）來事奉大國（明朝），亦即可謂李成桂的「事大主義」的由來。

¹³ 李相佰，〈李朝建國的研究（二）〉，《震檀學報》，第 5 輯，1936。

¹⁴ 昌王元年（1388）7 月，趙浚上疏私田改革方案，即從改良全國土地作業着手。恭愍

放逐。以後李成桂經過「廢假立真」的事件之後，¹⁵實際地掌握了軍事與政治的最高權力，以李成桂爲中心的新進改革派人士完全排除了舊勢力，而終於更進一步地取得了國家政權。

再者，關於麗末的元明政權交替期，居住在遼東地區的女真族（野人女真），他們的分布和動態，論述如下：

元朝統治中國東北居住的女真族時，在遼東行省下設置了遼陽路、廣寧路、大寧路、東寧路、瀋陽路、開陽路、水達達路、咸平府、合蘭路等十二州十縣。期間，女真族原本是過著十分安定的生活。可是此時正值中原紊亂的情勢，因此，也造成了東北女真族的混亂，進而對女真族的影響很大。即元將女真人納哈出和女真酋長胡拔都等二人陸續地侵略東北面一帶之後，女真部族之間長期失去了安定的生活。雖然李成桂將他們擊退了而恢復了東北面一帶的平靜，但是女真居民的心理都有著遭到納哈出和胡拔都等二人剽掠的傷害陰影，難以平復。¹⁶如此，女真的勢力與分布，便發生了變化。即爲了逃避納哈出和胡拔都等二人剽掠的女真族群，大多數都拋棄自己的原有根據地，移居到東北面海岸地帶了。

女真的居住地從遼金以來一直在韓半島北部地域。元末，高麗因遭到中國紅巾賊的侵入，女真族也連帶地受到極大的禍害。¹⁷所以，明洪武年間（恭愍王與示禹王時期），這群女真人便向南投奔高麗，或向逃西往遼東。其原因都是戰亂之故，女真族的勢力和分布上再一次帶來了大變化了。¹⁸即這群女真人們時常遭遇戰亂因而無法安居，所以多避難於其居住

王 2 年，燒盡原有的公私田籍。昌王 3 年，公布新田制的基準，名爲科田法。即京畿以外的全國土地全部納入公田，沒收農莊。所以權門勢族的經濟基盤完全崩潰而沒落了。同時也象徵了高麗王朝的沒落。也是建立了朝鮮王朝的經濟基礎，如此公田的增多使得國家收入增加。

¹⁵ 由於高麗的國姓是王氏，李成桂認定示禹昌兩王是爲辛氏而並非王氏，所以廢除示禹昌兩王王位，擁立高麗王室的王氏，即恭讓王王瑤的過程。

¹⁶ 《高麗史》列傳，卷 47，示禹王 8 年 7 月壬戌：「女真人胡拔都，東北面人民虜掠走。」

¹⁷ 《高麗史》世家，卷 39，恭愍王 7 年 5 月甲辰：「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咸北吉州）。」《高麗史》世家，卷 42，恭愍王 19 年春正月戊申：「女真萬戶弓大獻萬物，以部落一百戶請隸正陵。」

¹⁸ 《明實錄》卷 116，洪武 11 年 5 月戊寅：「故元樞密副使史家奴等 41 人自遼東來降。」《明實錄》卷 116，洪武 14 年 11 月癸卯：「故元遼民 69 人自納兒舉來歸於女真千戶。」

地以外的地方。

高麗爲了平定上述的戰亂，反而造成女真族的強力反抗。¹⁹ 在那時元朝則無可奈何，深覺無力感，因此被高麗擴張了領土。可是具有「安居斯土」觀念的一部分女真酋長們，則不能忍受高麗的擴張領土行爲，表示將要抵抗高麗的意思。²⁰ 再者，明洪武年間，明朝開始進行經略遼東女真地區。明朝政府繼承了元朝曾經統治的遼東女真地區的統治制度，對女真族施行「分治」和綏撫政策，大量地設置「羈縻衛所」。而對女真族進行招撫的政策。於是明朝控制了遼東女真地區。²¹

五、李成桂的東北面女真勢力與對東北面的治理

關於李成桂的家世方面，其高祖父李安社從朝鮮半島南部的全州，經由中部的三陟而來到了東北面的宜州。²² 此時正值高麗武臣政權的統治時期，也是元朝來侵的時期。高麗政府任命李安社爲宜州兵馬使，對元朝展開抵抗的結果，支配了當地的女真人和百姓，以有組織的方式統率女真人與當地的百姓。而且，李安社也對元朝表示降服，接受元朝的千戶職。²³ 所以李安社便隸屬於元朝的雙城總管府之後，他的勢力受到認定而得以維持。更甚地，李安社一方面結合了當地女真人的勢力與流移民集團，一方

《明實錄》卷 116，洪武 15 年 2 月壬戌：「故元鯨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答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化自女真來歸。」

¹⁹ 《高麗史》世家，卷 39，恭愍王 6 年 8 月戊午：「都堂呈行省書曰：照得雙城・三撒等處，元是本國地面，……因失關防，致被女真人衆盡殺州縣官吏，就得地土人民，……計及將和州更名雙城。」

²⁰ 《高麗史》世家，卷 40，恭愍王 3 年 2 月乙卯：「趙小牲引誘納哈出入寇三撒。」

《高麗史》世家，卷 40，恭愍王 11 年 12 月癸未：「以壽春山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高麗史》世家，卷 40，恭愍王 13 年春正月：「女真三善・三介等寇忽面、三撒。」

²¹ 恭愍王 20 年，即從明洪武 4 年（1371）開始，明朝繼續在遼東設置遼東衛指揮司，定遼都指揮使司等 25 衛與安樂州・自在州。其管轄範圍是在遼河東西兩岸地域一帶。楊暘，《明代東北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莊秀松，〈羈縻衛所和羈縻政策〉，《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4 期，1992。

²² 李成桂的先祖初次移居東北面定着的是李成桂的 4 代祖李安社。李成桂的家系圖如下：《龍飛御天歌》第 1 章：李璘--李陽茂--李安社--李行里--李椿--李子春--李成桂（穆祖）（翼祖）（度祖）（桓祖）（太祖）

²³ 《龍飛御天歌》第 16 章：「穆祖爲五千戶達魯花赤，東北之人咸歸心焉，王業之之興自此始。」此內容目的是要將穆祖李安社對元朝降服，暗中對元朝展開抵抗的描述，進而說明李成桂因此得以建立朝鮮的理由。

面運用其原具有影響力的家世而成長壯大起來了。

後來李安社離開宜州移居幹東之後，其子李行里又再回到宜州，曾經位於雙城揔管府的永興北邊也確定成為他的勢力。其後李行里之子李椿從宜州移居咸興。以後，咸興變成為李成桂的根據地了。而且李成桂的父親李子春在恭愍王時期擔任東北面兵馬使，東北面女真族百姓們全都編入在李子春的勢力下了。這股勢力是進入女真地區之後，依照李子春的命令，使得當地的百姓們又都回到高麗中央政府的統治。如此雖然表面上，女真族是屬於高麗的管轄，但是，東北面百姓們寧可編入到李子春的個人勢力範圍之下。

因此，李成桂的家族勢力是以高麗末期在女真東北面地區散居的女真族與高麗流移民集團為基盤，李成桂賴此東北面勢力而進入高麗中央政府，於是鞏固了自身的勢力。即李成桂經由高祖父李安社傳給他的東北面女真勢力來做為軍士基盤，利用此基礎來統帥流移民和女真人們，而擴展了其家族勢力。同時，東北面一帶再次被高麗收復了。因此，李成桂位於女真東北面地區的家族勢力，獲得高麗中央政府認定了。而李成桂位於的家族勢力即所謂「家別抄」集團。²⁴

經過以上的論述，李成桂的家別抄集團，即從其祖先傳來的女真族來做為其軍士基盤之外，又吸收了東北面一帶的其他家別抄集團，如此擴張了他的軍士集團，掌握了東北面軍事行動。這就是李成桂的麾下勢力。²⁵而李成桂的麾下勢力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女真大酋長李豆蘭（李之蘭）了。李豆蘭是在恭愍王時期，首先派遣百戶甫介投降高麗。²⁶然後在移居北青來事奉李成桂，而隸屬於李成桂的軍士集團之中。如此李

²⁴ 所謂「家別抄」即當時是隸屬於東北面土豪，在高麗末從事軍事活動，而家別抄的組織成員均由女真族所構成，具有卓越的弓術、馬術與善戰等特性，所以曾經立下許多戰果。史載李成桂「親兵」便是指「家別抄」之意。參見金九鎮，〈對於吾音會幹朵里女真的研究〉，《史叢》第 17·18 合輯，1973。金九鎮，〈女真關係〉，《韓國史》V.22，SEOUL：國史編纂委員會，1995。

²⁵ 在高麗末期，中央政府不能掌握地方軍事，由幾位將帥們各自占有軍士，叫做牌記（軍士的軍籍）。即各道的一般百姓們也構成為軍士，而隸屬於幾位將帥的私兵，便稱為他們的麾下。閔賢九，《朝鮮初期的軍事制度和政治》，SEOUL：韓國研究院，1983。

²⁶ 《高麗史》卷 116，李豆蘭傳：「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恭愍時，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事我太祖，屬麾下。」

成桂的勢力更加壯大起來了。所以家別抄可說是李成桂的軍事基盤，也是李成桂的「家兵」，即以「私兵」來活動。

在李成桂的軍事陣營中，編制有相當數量的女真人，除了李豆蘭以外，也有其他的女真各部酋長們從遠方來加入到李成的軍事陣營之中，對李成桂效忠。例如：斡朶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奚灘訶郎哈；參散猛安古論豆蘭帖木兒（李之蘭）；移蘭豆漫猛安：甫亦莫兀兒住；海洋（都夫失里）猛安括兒牙火失帖木兒；阿都哥猛安奧屯完者；實眼春猛安奚灘塔斯；甲州猛安雲剛括；洪肯猛安括兒牙兀難；海通猛安朱胡貴洞；禿魯兀猛安夾溫不花；斡合猛安奚灘薛列；兀兒忽里猛安夾溫赤兀里；阿沙猛安朱胡引荅忽；紉出闊失猛安朱胡完者；吾籠所猛安暖禿古魯奚灘索孛牙；土門猛安古論孛里；阿木刺唐括奚灘古玉奴；兀郎哈的土門括兒牙八兒速；嫌真兀狄哈的古州括兒牙乞木那、答比那、可兒答哥；南突兀狄哈的速平江南突阿刺哈伯顏；闊兒看（骨看）兀狄哈的眼春括兒牙禿成改等。²⁷

如此，當時東北面地區以李豆蘭爲主的相當數量女真酋長們進入到李成桂的麾下勢力，積極參與了高麗末期各種的軍事活動。當然李成桂的麾下勢力中，不僅是有女真人的編成，也有從祖先傳來的東北面家別抄集團，以及恭愍王時期以後經由軍事活動而被編入的女真酋長們的軍事勢力，而創造了李成桂的軍事基盤。因此，李成桂以東北面女真族爲其勢力基盤，來擴大他的軍事陣營，使之更具備強盛的軍事力量，日後得以建立了新王朝——朝鮮。

李成桂對於東北面女真的經營，首先在恭愍王 5 年（1356），東北面兵馬使柳仁雨最初經營雙城（永興）的時候，雙城千戶即李成桂的父親李子春做爲內應，收復了咸州(咸興) 以北，建立功勞不少。恭愍王 10 年（1361），李子春擔任朔方道萬戶兼東北兵馬使之時，鎮撫了東北面。在同年去世。其後，李成桂與其父一起參與了對東北面的經營。同年，由於禿魯江（江界）萬戶女真人朴儀的叛亂，李成桂以東北面上萬戶之職，出兵前往江界，平定了朴儀之亂。因此李成桂對東北面的經營逐漸地穩固而強大了。

²⁷ 《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卷 8，4 年，12 月癸卯。

恭愍王 11 年（1362），叛人趙小生和卓都卿等占領在當時的潘陽地方，元將納哈出誘引侵入三撒（北青）與忽面（洪原）地方。高麗政府便派遣東北面兵馬使李成桂擊退納哈出。李成桂越過咸關嶺攻擊侵略者的駐屯地韃靼洞（洪原近處），消滅了敵軍。那時納哈出迅速地逃亡了，於是平定了東北面邊境。其後，納哈出經常派遣使者前往高麗，以表達善意。恭愍王 13 年（1364），女真人三善、三介等二人也不斷地誘致女真人，²⁸ 侵入三撒與忽面等地，占有了咸州（咸興）、和州以北。那時李成桂正在阻止高麗附元份子崔濡引元兵的侵犯，從西北面出兵，在隨州（定州）擊敗崔濡。同時因為三善、三介等二人的來犯，使得東北面十分危篤，李成桂也是從西北面大破三善、三介等二人，收復了和州、咸州等地方。此時，相當數量的女真人也歸順於高麗，投入到李成桂的軍事陣營中。

五、李成桂的最佳助手女真人李之蘭

關於李之蘭（即前文之李豆蘭）的生平與在政界的活躍情形，²⁹ 首先李之蘭是在高麗忠惠王元年（1331）出生的，而在朝鮮太宗 2 年（1402）逝去，享壽 72 歲。他本姓童，蒙古初名古論豆蘭帖木兒，字式馨。他曾

²⁸ 三善・三介等二人是李成桂的從兄弟，姓金。

²⁹ 關於本人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成果，請參見：

- （1）王永生，〈女真大酋長暨朝鮮開國功臣李之蘭對朝鮮王朝建國的參與〉，《中國邊政》，第 155 期，91。
- （2）王永生，〈女真大酋長李之蘭在朝鮮王朝建國過程的崛起〉，《滿族文化》，第 28 期，92.6。
- （3）王永生，《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韓國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史學科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6。
- （4）王永生，〈李之蘭研究－以朝鮮王朝建國與女真勢力關係為中心〉，《韓國學報》，第 18 期，93.6（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主辦，『第 12 屆中韓文化關係學術會議』論文發表）。
- （5）王永生，〈朝鮮建國期與女真交涉往來之史料文獻與史實研究－以李之蘭為例，高麗恭愍王～朝鮮太宗，1351～1423〉，《中國邊政》，第 158 期，93.6，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韓國高麗大學校共同主持之研究計畫案，即「中韓使節往來者資料整理研究計畫案」，本文是本人在該研究計畫案之中的第一年研究成果報告
- （6）王永生，〈朝鮮初期李之蘭的政治活動之研究〉，《韓國學報》，94.6 預定出版（2004 年第 7 屆環太平洋（亞太地區）韓國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發表 [2004.10.18-20]，主辦單位：第 7 屆環太平洋韓國學國際學術大會籌備處，承辦單位：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及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經是女真族的大酋長。在太祖李成桂的軍士基盤中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對於朝鮮王朝的建國，對於明朝，以及對於女真族等三方的影響力十分巨大。有關其記事如下：「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真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為千戶，恭愍王時，豆蘭遣其百戶介甫，以一百戶來投，賜我太祖，屬麾下。」³⁰ 這是說明李豆蘭（李之蘭）不是高麗人，而是來歸順高麗的女真人。他是女真的金牌千戶阿羅不花的兒子，因世襲千戶職而繼承受職。李豆蘭在恭愍王時期，首先派遣百戶甫介前往高麗，以後自己率領 100 戶向高麗投降。結果，他便居住在北青，效忠太祖李成桂，隸屬於李成桂的麾下陣營，「李」氏的姓是李豆蘭在恭愍王 20 年（1371）2 月，來投高麗後的賜姓。同時名字也改為李之蘭。所以李豆蘭和他的先祖一定是女真人無誤。³¹

李之蘭和李成桂（1335-1408）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和李成桂結成兄弟關係，兩人初次見面的地方是在介江上游（北韓咸鏡道境內），當時李成桂才只有 17 歲，而李之蘭也只有 21 歲。李之蘭雖然大李成桂 4 歲，但是始終是尊敬著李成桂，奉李成桂為兄，自謙為弟。武術出眾的兩人，每日射獵而常見面，所以兩人的兄弟友誼十分濃厚。李之蘭在高麗對女真沒有監視的狀態之下，即前述之元明政權交替的時期，以女真千戶身分，在恭愍王 20 年（1371）投奔高麗，正式服從李成桂的領導，當時他是 41 歲。³²

李之蘭投入到李成桂的麾下後，開始征胡伐倭，每次戰役都獲得全勝。³³ 例如：前述之恭愍王 11 年（1362）2 月，李之蘭在咸興平野，打敗納哈出。示禹王 9 年（1383）8 月，他因母喪，擊退對來侵的胡拔都。示禹王 11 年（1385）9 月與恭讓王 2 年（1391），李之蘭與李成桂一同擊退了倭寇。而且李之蘭在示禹王 14 年（1388）5 月，也參加了威化島的回軍。李之蘭因對朝鮮建國有功，受勳時是被封為一等功臣，可以說李之蘭是李成桂最佳的得力助手。李之蘭雖然出身異族對朝鮮王朝而言，始

³⁰ 《高麗史》卷 116，列傳 29，李豆蘭傳。

³¹ 徐炳國，〈李之蘭研究〉，《白山學報》第 10 輯，1971。

³² 《青海李氏新譜》2，青海伯實記後。

³³ 《朝鮮王朝實錄》太祖，總書，辛示禹 6 年 8 月。

終深具忠誠之心，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李之蘭建立許多戰功，爲此，李成桂正式賜以「李」姓來做爲報答。日後，李之蘭在女真各部族之間的名望高升，成爲重要的人物了。太祖李成桂於是利用李之蘭如此盛大的名望來招諭全體女真族，以便能統治女真族各部。因此，明太祖也要憑藉李之蘭的偉名，達到懷柔女真的目的，而請求李之蘭征伐明朝治下的建州女真的叛亂。可知當時李之蘭在女真族各部族之間，以及在明朝國內，聲望頗高，實爲重要的人物。

由於明朝憑藉李之蘭的偉名，成功地平定建州女真之後，同時也想要懷柔李之蘭，促使李之蘭歸順明朝，但是被李之蘭所婉拒了，明朝則策冊封李之蘭爲凱旋將軍，歸還朝鮮。太祖李成桂以李之蘭不被明朝懷柔政策所左右，而忠心歸還朝鮮，特別冊封李之蘭爲青海伯，予以嘉賞。³⁴

之後，明朝不僅想對遼東地區的女真族進行懷柔，甚至連朝鮮東北面的女真族都想要懷柔之，雖然明朝如此大力執行對女真的懷柔政策，但是其結果，朝鮮的懷柔女真政策反而勝過了明朝的懷柔女真政策。而且女真因爲極爲滿意朝鮮政府的施惠而樂意順從，所以朝鮮透過李之蘭的影響力，成功地實行對女真的和平政策，朝鮮與女真的往來關係，日益友好頻繁。

所以，李之蘭投向高麗之後，隸屬在李成桂麾下以來，李成桂每事都和李之蘭商議，結成同盟關係，始終一起同行於軍事行動。因此，李成桂的威化島回軍，李之蘭也參加了，以後李成桂登基新王，對於有功的李之蘭封爲回軍與一等開國功臣。結果李之蘭以女真人的身分受到最高禮遇，實屬難得。可知朝鮮建國過程中，李之蘭的貢獻是十分卓越的。

再者，對於其他向化女真人的考察方面，在高麗末期，有許多女真酋長來投，例如：金高時帖木兒、許難豆、童甫下、阿里等在朝鮮太祖時期則有：幹朶里、火阿哈、托溫等部族。而在太宗時期則有：溪關、參散、禿魯兀等部族。這群女真各部族因仰慕太祖李成桂的仁政德治與李之蘭的偉名與威望而陸續地向化於朝鮮，便成爲朝鮮的國民了。

最後，探討女真族對李成桂的朝鮮建國的意義和影響方面。李成桂的朝鮮王朝建國，是爲了去除妨礙韓國社會發展，即剷除高麗王朝內部的

³⁴ 徐炳國，〈李之蘭研究〉，《白山學報》第10輯，1971。

社會矛盾，而開始進行的。³⁵ 而且當時的女真族和朝鮮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尤其是對於朝鮮的建國，女真族助力可說是相當之大。筆者的見解是女真族對朝鮮建國貢獻的事實是絕對不能否認的。對此，太祖李成桂運用東北面女真勢力，而建立了朝鮮王朝。因此女真族對於朝鮮王朝的建國的貢獻是不少的。特別是女真族大酋長李之蘭的成就更是不容輕忽的。尤其透過女真族大酋長李之蘭的號召下，衆多的女真各部族都來歸順朝鮮王朝，成為朝鮮的子民。另外，女真族和朝鮮在地理上隣接之故，以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而言，相互往來十分頻繁。總之，李成桂在位期間，使得雙方之間完全和平相處，沒有發生戰事的情形。

因此，女真族與朝鮮之間持續維持著友好、親善的關係，雙方之間不斷地進行往來與交流。³⁶

六、結論

朝鮮太祖李成桂經營東北面，通過女真勢力，使得他的軍事後援基盤更加穩固，再經由威化島回軍事件的契機之下，朝鮮王朝得以建國。尤其是李之蘭歸順高麗，加入了李成桂的軍事陣營之後，對於女真東北面地區實施的招諭□綏撫等安邊策，可以說是收到很好的效果。當時李之蘭作用及其影響力是非常巨大。

而且，朝鮮王朝和女真的關係比起明朝和女真的關係事實上更加密切，這可從韓國的《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等史料之中，對於女真族的史實記錄是十分豐富，而可得知。反觀中國的《明實錄》之中，則對於女真的記事反而不多。因此，大致上而言，朝鮮太祖李成桂在位期間，朝鮮與女真族的關係是相當友好密切的，雙方交流往來的關係是十分頻繁而不間斷的。

（2004 年 11 月投稿，經兩次審查修正後通過）

³⁵ 河炫綱，〈朝鮮王朝的建國及其意義〉，《韓國中世史論》，SEOUL：新丘文化社，1989。

³⁶ 滕紹箴，〈從朝鮮『李朝實錄』看明代女真族與朝鮮族的友好關係〉，《延邊大學學報》，第3期，1981。

新譯注釋《蒙古秘史》漢文版的幾點補充

泰亦赤兀惕·滿昌

中國內蒙古教育學院教授

新譯注釋《蒙古秘史》漢文版，現有三種版本：一是謝再善版本，一是道潤梯步版本，一是札奇斯欽版本。謝再善版本是依據蒙古榮·達木丁蘇隆現代蒙語編譯的《蒙古秘史》漢文版，所以學術性較差¹。道潤梯步版本是以葉德輝版作底本的新譯簡注《蒙古秘史》，內文是古文體，註解是現代語的，整體上不文不白的，並且錯處較多，據不完全統計，錯有400餘處。由於此書缺乏實用性，即缺乏學術性，所以學術界基本上否定了道氏版本²。札奇斯欽版本是以顧廣圻版本作底本的新譯並注釋版³。應該說，札奇斯欽教授的新譯本是近來《秘史》漢文版的一個突破，也是《秘史》研究中的一個新成績。作者在譯注此書時參閱了近百部（篇）史料，注有一千三百餘條，二十五萬字，真是達到了精辟的地步。新譯本以字譯為主，意譯為補，文字通順易懂，並保持了原文的風格。注釋以詞彙註解和歷史文件的解釋相結合，並有人名、地名解釋，注釋的深刻和範圍都達到了高度水平。可是《蒙古秘史》的研究，與其它學科的研究一樣，要不斷的深入，不斷的完善，不斷的發展。所以，某一人、某一時要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那是很不容易的。正如札奇斯欽先生所說的：「民國後蒙古學或阿爾泰學的研究上，秘史一書是眾所熟知，而且更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一部書。無論翻譯或是漢譯，都難免引起爭辯……當然，這是學術研究的正常現象，也是引起更深的研究興趣的地方。」⁴。

所以，爲了引起更深的研究，筆者就上面所提的《蒙古秘史》三種漢

¹ 姚從吾：「漫談『元朝秘史』」（代序），札奇斯欽：《新譯並註釋「蒙古秘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台北。

² 亦鄰真：「評道潤梯步『蒙古秘史』」，《中國歷史》，1984年；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呼和浩特市。

³ 札奇斯欽：《新譯並註釋「蒙古秘史」》。

⁴ 札奇斯欽：《新譯並註釋「蒙古秘史」》，序。

文版提幾條不成熟的見解，作為補充，希望學術界和作者參閱。

一、有關《蒙古秘史》中幾個蒙語之討論

現行的《蒙古秘史》是漢字體蒙古語版本。原文在撰寫蒙語時，對有些名詞的標音不確切，有錯標錯記的現象（或後人轉抄過程中有錯抄、錯寫的地方）。而這些名詞有的關係到蒙古地理歷史方面。所以在翻譯此書的時候，對原文的錯處應予以校正，並加以注釋，這也是一項不可缺少的學術工作。三種漢文版新譯《秘史》，在這方面也做了些必要的校正，但對有些名詞仍然未做校正，譯從原文。筆者在這方面發現了幾處記在下面：

（一）《秘史》第四卷 141 節記載：雞兒年（1202）合答斤、撒勒只兀愣、塔塔兒、泰亦赤兀惕等十六部立誓結盟，「從那裡順著額爾古涅河前進，到刊河水注入額爾古涅河之處的三角洲地方，在那裡擁立札木合為古兒汗。」此句的刊河（原文）三種漢文譯本也作「刊河」。其他一些史料中有「刊河」、「汗河」、「干河」、「根河」等不統一的記載。

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有三河地區，是因該地區有三條河流而馳名於世的。三河牛三河馬就產於此地。這三條河是：哈布爾河注入特勒布爾河（telbūr），特勒布爾河注入革根河（漢語根河），革根河注入額爾古納河。《秘史》所記載的「刊河」便是革根河（gegen Goul）。古蒙語中「革 Ge」發「刊 Ke」音的習慣，所以在《秘史》中將「革根河（根河）」記為「刊河」了。

（二）第五卷 150 節記載：「其後，客列亦惕【部】的札合敢不，從土兒扈特【部】前來與成吉思可汗作伴」。漢譯版將此句譯為「其後，成吉思汗在帖兒速惕的時候，客列亦惕的札合敢不前來作伴。」原文旁譯將「帖兒速惕」標為「地名」，《聖武親征錄》也稱「帖兒速」為地名也。現發行的各種《秘史》版本中均安以「帖兒速惕 dersüt」「帖兒速 dersü」芨芨草為命名的地名來譯作和解釋的。

據筆者考察，《秘史》原文有誤，「帖兒速惕」是「土爾扈特」的訛誤。羅伯桑丹津的《黃金史》將此詞記為「土兒扈特」，寫道：「其後，客列亦惕的札合敢不從土兒扈特【部】前來與成吉思可汗作伴。」當時客

列亦惕【部】和土兒扈特【部】是屬一個氏族，這同泰亦赤兀惕與蒙古一個氏族一樣。王汗弟弟札合敢不雖然是客列亦惕部人，但他前來與成吉思可汗作伴的時候在土兒扈特，是從土兒扈特來的。豬兒年（1203）年春季，客列亦惕部的王汗在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之地與成吉思可汗交戰時，札合敢不已經離開了土兒扈特，沒有參與這次大戰。

在土兒扈特民間流傳的脫妥文《土兒扈特史》及《土兒扈特貴族家譜》等文獻中，都明確寫道翁罕為土兒扈特首領或土兒扈特人的祖先。

《土兒扈特史》開頭寫道：「我土兒扈特人的祖先翁罕。翁罕之子阿爾思蘭，阿爾思蘭之子阿木古郎，阿木古郎之子克依那，克依那之子蘇遂，蘇遂之子巴雅爾，巴雅爾之子蒙克……」⁵。高文德、蔡志春編纂的《蒙古世系》第四十六表厄魯特蒙古土爾扈特部世系中是按：「翁罕—○—奇旺（克依那）—蘇賚（蘇遂）—巴雅爾—瑪喀齊蒙克……」⁶順序排列的。上面所說的翁罕，就是《秘史》上記載的客列亦惕首領—脫斡鄰勒（to'oril）王汗矣。

三種漢文版新譯《秘史》中也提到關於客列亦惕與土爾扈特是屬一個氏族的情況，寫道：「客列亦惕 *kereyid* 在成吉思可汗創業之前，是居在蒙古中部的一個強大的部族。其裔仍存。今新疆地區之蒙古土爾扈特 *torGa'ut* 族及南俄伏爾迦河口卡爾馬克 *kalmück* 蒙古，其中以 *kereyid* 為姓者頗不乏人，且其貴族多為王汗之裔」⁷。

那麼，脫妥文《土爾扈特史》及高文德、三種漢譯《秘史》所說的土兒扈特的祖先是王汗，客列亦惕—土兒扈特原來是屬於一個氏族的依據是什麼呢？他們沒有闡明這個問題。我以為「依據」就是這裡所闡明的《秘史》第 150 節中的「土兒合兀惕 *torGa'ut*—土兒扈特」。這便是《土兒扈特史》的最初的源頭。

並且，漢譯版將此句的意思也給顛倒了。原文沒提成吉思汗在哪兒，而是「其後，客列亦惕【部】的札合敢不，從帖兒速惕的【地方】前來與成吉思汗作伴」的。而不是「成吉思汗在帖兒速惕的【地方】時札合敢不

⁵ 《土兒扈特史》脫妥文油印本。

⁶ 高文德、蔡志春：《蒙古世系》，中國社會科技出版社，1979 年。

⁷ 札奇斯欽：《新譯並註釋「蒙古秘史」》，第 102 頁。

前來做伴的」。所以我們在這兒所託證的不只是「帖兒速惕 *dersüt*」之地理名詞或「土兒扈特 *torGa'ut*」之氏族名稱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土爾扈特部族史的，有歷史意義的問題。

（三）第六卷 170 節記載：「客列亦惕部王汗在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沙磧），與成吉思可汗作戰時說：將我們的軍隊陳列為……繼董合亦惕【氏】之後，由豁里·失列門太子指揮王汗的一千土兒合兀惕去衝。繼一千土兒合兀惕後面，由我們的中軍大隊去衝之！」三種漢譯版將此詞譯為「……繼董合亦惕之後，由豁里·失列門太子，所指揮我們的一千護衛去衝。繼一千護衛之後，叫我們的大中軍去衝吧！」此句中的「土兒合兀惕 *torGa'ut*」一詞，旁譯作「*torha'ut*」（護衛）。現行的《秘史》各種版本均以旁譯為據，「土兒合兀的」併成「*torha'ut*」，譯成王汗的「護衛軍」。

「土兒合兀惕」一詞，在此段中共出現四次（不計上面所述的 150 節：「帖兒速惕—土兒扈特」），即 170 節：（1）「土兒合兀的」，（2）「土兒合正敦」，（3）「土兒合兀敦」，171 節：（4）「土兒合兀的牙兒」等。阿拉坦奧其爾、賀希格巴圖等人還原的《蒙古秘史》（油印本）中把這四處「土兒合兀的」一詞併為：土兒—*tor*，合兀—*Ga'u*，的—*d*（的—*dl*，併為半音 *d*），均譯作（1）「*torGa'ud*」（2）「*torGa'udun*」（3）「*torGaudun*」（4）「*torGa'udjan*」。

羅孛桑丹津的《黃金史》裡將這四處的「土兒合兀惕」，都明記為「土兒扈特」，這是否在羅孛桑丹手頭的《秘史》和阿拉坦奧其爾、賀希格巴圖等人還原的《蒙古秘史》都明記著「土兒合兀惕」呢？

王金絨先生在「土爾扈特與杜爾伯特民族之由來及其生活狀況」一文中認為：「土爾扈特者，即蒙古語轉徙無主的商人之義也，不是『護衛軍』」（原載《真知學報》三卷二號，一九四三年）⁸。

其實，對此句字面上的理解也應當是「土兒扈惕【氏】」。因為中軍大隊便是以護衛軍所組成的，也就是秃兒合黑是中軍大隊的一部分。例如，《秘史》第九卷 226 節寫道：「自各千戶選拔出來的組成了八千侍

⁸ 王金絨：「土爾扈特與杜爾伯特民族之由來及生活狀況」，《真知學報》三卷二號，1943 年。

衛，宿衛與弓箭手二千，共一萬名護衛。成吉思可汗降聖旨說：『加強我們身邊的一萬名護衛，作為中軍大隊。』」我們認為成吉思可汗的軍隊編制是這樣，王汗的部隊編制也是這樣的。所以，文中一面提到「我們的中軍大隊」的時候，另一面卻提「王汗的一千護衛」是不可能的。這便是與客列亦惕屬一個氏族的「王汗的一千土兒扈特，或者至多是以一千土兒合兀惕所組成的護衛軍。」將這個「一千土兒合兀惕 torGa'ut」由豁里·失列門太子所指揮。

其次，在記載氏族「土兒合兀的(惕)」和護衛「秃兒合黑」二詞上也是很分明的。氏族「土兒合兀的」，在《秘史》中出現四次（第 170 節三次，第 171 節一次），只有一種寫法「土兒合兀惕」。而護衛軍的「秃兒合黑」，在《秘史》中共出現四十二次，有兩種寫法，其中第 79、191、192 節八處記為「土兒合兀惕」，其餘 226、278 等十四節三十四處均記為「秃兒合黑」或「秃兒合兀惕」。在此，這兩個名詞「土」、「秃」（tu 與 d）的寫法和發音上都有區別。

新疆學者在撰寫《委拉特蒙古史》時寫道：「土兒合兀惕」一詞是十五世紀出現的名詞，因為土兒合兀惕部的姑娘們長得漂亮，像緞子那樣光彩奪目，所以「土兒合兀惕」一詞是由此而來云云。其實，「土兒合兀惕」一詞是老早就有，《秘史》中出現多次，「土兒合兀惕」部與客列亦惕是一個部族，是客列亦惕部的一個分支。這樣一個大部族下面多分支部落的記載《秘史》中有多處。關於「土兒合兀惕」一詞，各種蒙文還原版本也都錯了⁹。所以，我們論述的「土兒合兀惕」一詞，不只是論證一個名詞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土爾扈特這一部落氏族的歷史問題。

二、有關漢譯版《蒙古秘史》譯解之討論

三種漢譯版《蒙古秘史》有不少錯譯誤解原文的地方。例如：

（一）第六卷 182 節記載：客列亦惕部王汗與成吉思可汗在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沙磧）作戰後，「帖堆，成吉思罕、斡都阿惕、巴勒渚

⁹ 巴雅爾《蒙古秘史》還原版，1981 年；額爾登泰·阿爾達札卜還原注釋《蒙古秘史》，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 年；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7 年，等版均稱「土兒合兀惕」為「秃兒合兀惕」，還原為「衛兵」也。

納、納語兒、保兀罷。田迭、保兀灰突兒……汪古敦、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荅察、阿三、撒兒塔黑台、察罕 蔑額禿、敏罕、亦兒格思、蹕兀周、額湍古捏、沐連、忽魯兀、不 合惕、客列門、忽荅勒都周、阿不剌、阿亦速侖、巴泐渚納、兀速閑幹羅灰突兒、兀赤刺罷。”《秘史》總譯將此節譯成：「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泐渚納海子行住了。那裡正……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峨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此文把「阿三、撒兒塔黑台、察罕 蔑額禿」譯成爲「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白駱駝一個…。」新譯三種版漢文《秘史》裡依據總譯，並對「阿三」作了註解，寫道：「阿三似爲回回人名 Hassan 或 Asam 之對音。原文稱他撒兒塔黑台 Sartaghtai 人，即當時中亞或西亞回教徒之意。他的出現，說明當時塞北經濟活動範圍的寬廣。許多學者也都這樣理解，所以在研究《秘史》的許多中外史料中說什麼「成吉思可汗在巴泐渚納湖極度爲難時，回回（撒兒塔黑台）商人阿三，捐獻一千隻羯羊，對成吉思可汗的創業做出極大的援助」啦！說什麼「回回阿三當時在蒙古地區經商，對蒙古與中亞、西亞的商業流通起到一定的作用」等等。

據筆者所考察，將此節應譯爲：「不久成吉思可汗遂去巴泐渚納湖下營，在那裡下營時……又有一個牽著回回【氏】的駱駝的阿三，從汪古惕【部】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那兒，趕著一千隻羯羊，順額峨古涅河一帶購買貂鼠灰鼠而來，他們在巴泐渚納湖飲水時相遇了。」這樣「阿三撒兒塔黑台、察罕、蔑額禿」一詞就被譯爲「阿三某人，牽著回回(氏)的白駱駝……」的意思了。阿三此人，在蒙古與中亞西亞之間經商，倒販牛羊，貂鼠灰鼠之類。這就是說成吉思可汗在巴泐渚納湖極度困難的時候，趕來一千隻羯羊，捐給成吉思可汗的不是回回阿三，而是蒙古兀良海氏阿三。

元朝三惲所寫《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文云：「太祖皇帝在班木納海時，其父哈班嘗以群羊餉帝，中途遇盜被執。忽魯渾及弟繼至，以弋刺盜殺之，餘黨逸去，遂脫父難，餉牽竟達於上。」《元史》卷 122「雪不台」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哈班生二子：長霍魯深，次雪

不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泥河，今龍居河也。哈班驅群羊入貢，遇盜遭執，雪不台及兄霍魯深隨至，刺盜殺之，眾潰去，哈班得以羊進帝所。」

在蒙語裡詞首的元音一般帶有摩擦音“h”，如「阿爾班 arban（十）爲哈爾班 harban」，「額里格 əligə」，（肝）爲「赫里格 həligə」，「亦纏 iɣəŋ」爲「希纏 hiɣəŋ」，「兀剌安 ula'an」（紅）爲「忽剌安 hula'an」等等。所以，將「阿班」發爲「哈班」是不足爲奇的。這個「阿班」，可能就是此節（182 節）中的「阿三」。歷史文獻中把「三」與「班」給混淆了，這個阿三或哈班（阿班）是兀良哈氏蒙古人，是勇士速惕額台的父親。阿三（或哈班）具有撒兒塔黑台（回回）產的白駱駝，趕著一千隻羯羊，在巴泐渚納湖貢獻與成吉思可汗。所以蒙古與中亞西亞之間經商的不是撒兒塔黑台（回回）阿三（哈班），而是擁有撒兒塔黑台（回回）產的白駱駝的兀良哈氏蒙古阿三（哈班）。請供參考。

（二）第十二卷 272 節記道：兔兒年（1231）斡歌歹可汗征伐金國時突然患病，口舌麻木不仁，在生死難解的時候，拖雷太子按著巫師的旨意，代替可汗哥哥去死。臨死的時候說：「亦列宜必亦刺黑罷；合荅宜必合惕忽罷。」旁譯將此句譯爲：「面前行我勝了，在外行我刺了。」三種漢譯本依著旁譯把這句譯爲：「我曾經勝過迎面來的（叛逆），我曾刺傷在遙遠的（敵人）。」學者們在「亦列 ilə」、「合荅 hada」二詞上理解不一致，有各種各樣的翻譯和解釋。

根據筆者考察，「亦列 ilə」、「合荅 hada」是金國兩員大將的名字。《秘史》第十一卷 251 節記載：在狗兒年（1214），成吉思可汗再次征伐金國，金朝皇帝得知成吉思可汗由潼關口進出，命亦列、合荅、豁孛格禿兒（此三人名詞與第 251 節 272 節的寫法均相同）三人統帥軍隊，以紅衣軍爲先鋒，把守潼關口。在潼關，成吉思可汗與亦列、合荅等金軍激戰時，拖雷和出古駙馬二人橫衝過來，擊退紅衣軍，戰勝亦列、合荅，好像摧毀朽木一般地殲滅了金兵。成吉思可汗因拖雷，出古駙馬二人打得好，對二人重加恩賞。所以，在此（272 節）所說的「亦列」，「合荅」，也就是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樞密副史移剌·蒲阿二人。

接下，拖雷太子替斡歌歹可汗去死時，激動地說道：「我曾勝過亦

列；我曾戰過合荅」。這正不是回憶當年（1214）跟隨父汗南征金朝，在潼關激戰亦列、合荅二將情景嗎？對拖雷來說這不是應該誇耀的事蹟嗎？

（三）第十二卷 280 節記載：「窩歌台汗發布聖旨，詔告全國各地進貢的決定。並對違者採取制裁措施，說：『斡豁兒、不吉、都塔兀魯阿速、斡兒豁里牙兒、

oqor bugi duta'ulu'asuorqol-iyar

合合思、阿勒答勒壇、孛勒禿孩。合勒不合、客客孫、都塔兀魯阿速、合巴兒、

qaqasaldatan bolutuqai qalbuqa kekesün duta'ulu'asuqabar

合合思、阿勒答勒壇、孛勒禿孩。

qaqas altaltan bolutugai

三種漢譯版本依照旁譯將此段譯為：「倘比我們這裡所限定的缺了（一根）短繩，就劈開（他的）嘴唇，若缺少了（一部）車輻，就劈破他的鼻子！」並解釋道：「本節末一句，總譯作：『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或係根據元代中葉以後的體制而譯出的，與原文頗有出入。按原文是施以裂唇割鼻的體制而不是處以財產刑的。」學者們對此句理解不一，有種種翻譯和解釋，出現了複雜的情況。

按筆者理解：套牛車時需用套繩、牛鞅子（軛）和扣繩。文中「不吉」便是套牛的「扣繩」。科爾沁口語為 buig，不是用繩子做的，而是用小圓木棍作的（注：怕磨破牛脖子，繩中間栓小木棍，有的地方用半圓形的或三角形木棍）。所以「不吉」一詞是現代蒙語中普遍使用的普通詞彙。在古代「不吉」是以繩子作的（現在呼倫貝爾等地也用繩子做），原文稱「倘若缺了半節扣繩」，就是以「扣繩」作比方的。文中「斡兒豁里牙兒 örGolijan」一詞，很多著作中誤解為 urulijan（嘴唇）。額爾登泰·烏雲達賚著的《蒙古秘史》詞彙選釋中解釋道：

「斡兒」（ör）： 1）心口下部、心坎、心窩。 2）帳幕中心的鋪墊物、蒙古包中正按置爐灶之處、中心、中央。

「Gol」： 1）中央、中心、主要； 2）河川； 3）心。

「örGol」：正中、正中間之意。

注意！不要把這個詞組理解成 *urul*（嘴唇）一詞¹⁰。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研究所編的《蒙漢辭典》解釋道：「*Gol*」1)正中、心口；2)蒙古包火撐子的圍子。從以上解釋來看「斡兒豁里 *örGol*」一詞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心口、心坎、人體五臟的中心部位；二是指帳幕或蒙古包中心按置爐灶之處。那麼從制裁的意義上來講「斡兒豁里牙兒」一詞，不言而喻是指家產了。原文「合合思、阿勒答勒壇、

hagasaldaldan

孛勒禿孩」旁譯譯為：「劈破、斷沒、教做者」。此詞組應是「沒收其家財之一

boltuGai

半」。這樣此句的完整意思是：「倘若缺了半節扣繩，就沒收共家財產之一半。」

第二句：「合勒不合、客客孫、都塔兀魯阿速、合巴兒、合合思、阿勒答勒壇、孛勒禿孩，」是上句的對稱句。「合勒不合」（車轂）是車輪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軸的地方。「客客孫」（車輻）是連結車轂和車輞的直條。「合巴兒 *habar*」是現代蒙語的「合馬兒 *hamar*」（鼻子）。據沙格札蒙語解釋辭典和內蒙古大學編的《蒙漢辭典》「合巴兒」鼻子有兩層涵義：一是屬人體的五官之一的鼻子，從部位上講人的頭部和身體的中線部位；二是山鼻樑、鞋鼻樑、書鼻樑（書脊）等也都中線部位的。民間也有「合馬兒合西牙 *hamarhasija*」（柳條編的柵欄）。

那麼，在古代「合巴兒 *hamar*」除「鼻子」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呢。據民間傳說「合巴兒」是點畜群數量的最早的數量單位。「合巴兒」（鼻子）—「豁西忽」*husiGu*（五種牲畜）—「陶魯蓋」*tologai*（頭畜）等，以此順序變化發展起來的。所以，將此詞的古代涵義和現代涵義結合起來加以分析的話，不難看出「合巴兒」（鼻子）便是指畜群數量的量詞了。這樣該詞組的完整意思是：「倘若您缺車轂和車輻，就沒收其畜群的正一半。」

（四）第十一卷 254 節記載：「己卯年（1219）成吉思可汗出征回回

¹⁰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蒙古秘史」詞彙解釋》，第 127 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

（花刺子模）之際也遂夫人稟奏其汗位繼承者的問題時說：『捏兀列蔑圖、別耶、赤訥、

ne'üle metü beye činu

捏古思、斡都阿速、捏惕客勒、蔑圖、兀魯昔顏、客捏、格木？禿魯、蔑圖、

negüsodu'asunetgel metü ulus-ıyan ken-e gemü tulu metü

別耶、赤訥、禿勃巴思、斡都阿速、禿牙勃、蔑圖、兀魯昔顏、客捏、格木？』」

beye činu tulbas odu'asutuyal metü ulus-ıyan ken-e gemü

漢譯《蒙古秘史》依據旁譯將此段譯作：

假如你那大樹一樣的身體倒下去，

你那像麻穰一般的百姓托付誰呢？

假如你那基石一樣的身體倒下去，

你那像群雀一般的百姓托付誰呢？

漢譯文雖然通順達意，但也有可商討之處。如，原文「禿魯 tulu」和「禿勃巴思，tulbas」二詞不是「基石」和「倒下去」的意思。

《盟文分類辭典》稱：「禿魯 tulu」—白肚鱒魚；「禿魯巴阿 tulbaG-a」為鱒魚仔子。甄金先生的「罕位繼承權之爭，兼評成吉思合汗」一文〔附錄二〕中將此節譯作：

你那巨材般的金身，如果遷徙遠去時。

你那有組織的百姓，將委諸誰？

你那鱒魚般的玉體，如果脫離鱒魚仔而去時。

你那彩霞般的國家，將委諸誰？¹¹

所以，「禿魯 tulu」是鱒魚或白肚鱒魚，「禿勃巴思 tulbas」是「禿魯巴阿 tulbaG-a」的複數，是鱒魚的仔子。此詞在第石卷 245 節和第十二

¹¹ 甄金：「罕位繼承權之爭兼評成吉思令罕」（附錄之二），《內蒙古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三期。

卷 272 節中（上面舉例二）中也以此意思出現，均指「鱒魚」、「鱒魚仔子」。

（五）第五卷 164 節記載：「客列亦惕部王汗認爲自己年邁，倘若有個三長兩短的話，由誰來管理全國百姓，而憂愁傷感的說：『必、別兒、額朵額、

bi beredö'e

幹脫勃罷。納馬宜、幹脫勒周、溫都惕帖、合魯阿速，合兀赤惕罷、必、

ötölbenamayi ötöljü ündüt'-te qaru'asu qa'u čitbabi

合兀赤惕抽、合惕都惕塔、合魯阿速、合木黑、兀魯思、虔、蔑迭古。』」

qa'učitčü qadut-ta qaru'asu qamuq ulus ken medugü

三種漢譯版本將此句譯爲：「我現在老了，要登高山，成爲過去。倘若我一旦成了過去，上了山峰，由誰來管理全國百姓呢？」此段翻譯意思也不完整。

古代蒙古人有把貴族、可汗的屍骨安葬在山崖上的習慣。例如：《秘史》第 175 節記載成吉思可汗將「安荅」忽亦勒答兒的屍骨安放在合勒合【河】的幹峨兀訥【山】半斜的山崖之上。札木合死時候也曾提出「安荅賜死的時候，請不要使【我】流血而死，死後【請】將我的骸骨【葬】於高地」（《秘史》第八卷 201 節）。所以，「溫都惕帖、合魯阿速 ündüt'-te qaru'asu」一句是躺在山坡死了以後的意思。「合兀赤惕抽 qa'učitčü」是與上詞的並例句，旁譯說「舊了著」也就是「舊了、陳舊了」的意思，是死的另一種說法。所以該句應譯作：「我現在老了，已經接近上高山，成爲舊物了。倘若我上了高山，一旦成了舊物，由誰來管理全國百姓啊！」爲當。

（六）第 64 節記載：翁吉刺惕部人自古以來以女兒相貌，以【外】甥之客與其他部族作親戚交往，和睦相處，寫道：「巴、額兒帖、涅扯、翁吉刺惕、亦兒堅、合屯、合勒合壇、幹乞惕、幹赤勒田、者額因、只孫、幹乞納、汪格別兒、不列額、巴。」

漢譯版《秘史》將此譯爲：「我們翁吉刺惕人【自古】就是，夫人們

都有圍屏，女兒們都有侍者，外甥們相貌堂堂，女兒們姿色嬌麗。」此譯文與原文也有出入。文中「合勒合壇 *halhatan*」一詞的詞幹是「哈勒哈 *halh-a*」，是牌或團牌的意思。「合屯、合勒合壇 *hatan halhatan*」是，以女兒—以夫人爲牌，與其他部族聯繫。「幹赤勒田 *üčilten*」的詞幹是「幹赤 *üčil*」，是回稟，或奏事的意思；「幹乞惕、幹赤勒田 *ügchjit üčilten*」是以女兒爲牌與其他部族相互聯繫。「者額 *jige*」是指外甥，這裡是指自家女兒。所以此段應譯作：「我們翁刺惕人自古以來，以夫人爲牌，以女兒作伎者，以外甥的相貌，女兒的容顏來相處」爲當。

還有，在本卷 65 節中寫道：「納溫、可兀惕、馬訥、嫩禿黑、合刺由。

nu'un kö'üt manu nuntuq qarayu

幹勤可溫、馬訥、汪格、兀者克迭由，也速該、忽答、格兒、圖兒、米訥、

ökinkö'ün manu öngge üjekdeyüisüquda ger tür minu
幹都牙。」

oduya

此段是德·薛禪想與也速該巴禿兒作親家，邀請也速該到他家，看他小女孩之意。漢譯版《秘史》將此段譯成：「我們好男兒要看他出身何處；我們的女兒，要看她的姿色。也速該親家：到我們家去吧。」此譯文與原文出入甚大。原文「嫩禿黑 *nutug*」，旁譯作「營盤」，現代蒙語作「努圖克」，也作家鄉。「嫩禿黑，合刺田 *nutug haratan*」即守衛家鄉，或看守家業。「汪格 *ünge*」，旁譯作「顏色」，現代蒙語作容貌，或相貌。「汪格、兀者克迭由 *ünge üjegdejü*」，旁譯作「顏色看有」，是逞顯容貌，或以容貌作爲被選的標準。所以此句的意思是：「我們的男兒要守其家業；我們的女兒，要以容貌爲標準。也速該親家！到我家去吧。」該句的意思，本來很明顯易懂的，只不過漢文譯者過於依賴旁譯了。

三、有關漢譯版《蒙古秘史》幾個單詞譯法之討論

三種漢文版新譯注釋《蒙古秘史》對單詞的釋法上也有些問題之處，

這對準切表達原文內容有一定關係。

(一) 第一卷 13 節記載：有一天朵奔·蔑兒干上山打獵，遇見一個兀良哈部人正在烤吃鹿肉。朵奔·蔑兒干就向他要鹿肉。那兀良哈部人自己只拿了「阿兀失吉禿·只勒都、阿刺孫、亦納、阿卜抽」，其餘將之給了朵奔·蔑兒干。此段中的「只勒都 jildü」一詞，三種漢譯版本依據旁譯譯作「半截腔子」。「只勒都」「主勒都」，這是指獵獲物或家畜的氣管與心、肺連在一起的部分。古代蒙古人把它看做吉祥和靈魂的象徵。額爾登泰、烏雲達賚二位解釋道：「主勒都 jildü 是指動物的靈和內臟、心肺而言。在古代，人們認為 jildü 代表整體或首要部分，而且當作靈魂的象徵。如《秘史》第 13 節，兀良哈人不惜把全部鹿肉送給朵奔·蔑兒干，卻不把 jildü 送給他。內蒙古的有些獵民認為：如果把獵獲物的 jildü 送給別人，就會失去「運氣」，以後就不容易獵獲野物。蒙古族的舊俗，殺馬殉葬，剔取其 *ᡩᠠᠯᡳᠳᠠ* 放在死者墳墓頂端；薩滿祭天，用羊的 *ᡩᠠᠯᡳᠳᠠ* 作為全羊的「替身」。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寢）用馬的 jildü 表示獻牲祭祀 jildü（神靈）¹²。jildü 後又轉為首功、冠軍之意。《秘史》第 214 節記：主勒都 jildü 為「頭功」。內蒙古科爾沁部的某些地區角力冠軍叫做 jildü。

(二) 第二卷 74 節記道：遵循賢良的訶額侖母親用「札兀合速、巴兒、帖只額克薛惕、可兀惕、札撒里壇、薛徹惕、孛勒罷」。此段的「札兀合速 ja'uGhasu」一詞，原旁譯作「山丹根」。三種漢文新譯本依著旁譯，並作了注釋。現行的《秘史》各種版本幾乎都譯為「山丹根」。據筆者考察「札兀合速 ja'uGhasu」不是「山丹根」。「札兀合速 ja'uGhasu」的詞幹是「札兀合 ja'uGh-a」，「札兀合速 ja'uGhasu」是「札兀合 ja'uGh-a」的複數。現代蒙語中「札兀合 ja'uGh-a」是榆樹花、榆錢或榆樹錢。榆樹春天開花，開白的、粉的、鮮豔小花，俗話說榆樹吐錢。ja'uGh-a，像銅錢一樣圓的，一串串的，像雪花一樣布滿樹枝，而後慢慢的成熟結仔。鄉下人一到榆樹吐錢就摘來吃，尤其是小孩們特別願意上樹摘榆錢。ja'uGh-a 榆樹錢是現代蒙語中的常用詞。

(三) 第三卷第 116 節記載：札木合和鐵木真二人起初在斡難河冰上

¹²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蒙古秘史」詞彙解釋》，第 304 頁。

打牌骨玩的時候，札木合把一個廐子髀骨給了鐵木真，換取了鐵木真的「稱古勒圖克禿、石阿 činggültuk tü ši'a」結為「安荅」。原旁譯將「稱古勒圖克禿、石阿」譯作「鋼灌的髀石」。三種漢文新譯《秘史》中依著了旁譯。據我考察「稱古勒圖克禿」是指坑或窪處。哲里木盟科左後旗有個稱古勒河—稱古勒窪地之地名，就是以坑和窪的地形命名的。

科爾沁地區將髀骨分名為：卜合、唐、馬勒、舍勒、翁古惕、更格勒等六面。將卜合與唐（凸凹）穿開，灌進鋁或錫，加工造成的髀骨叫做鋁髀骨。「圖克禿」是附加詞、動詞的變格。玩髀骨是蒙古地區青少年的比較愛好的遊戲，到冬天在冰上或地面投擲腳蹴等。

（四）第三卷第 117 節記道：鐵木真和札木合結為安荅後，鐵木真把擄掠蔑兒乞惕部時所得的脫里脫阿、別乞的「額思格勒、合里兀泥」送給札木合安荅。新譯漢文版將此段的「額思格勒、合里兀泥 esgel haliGunni」譯為「幾年來不生駒的海驢馬」。據筆者所知蒙古人沒有將騾馬（幾年不生駒也好）贈送禮品或授予獎賞的習慣。「額思格勒 esgel」是四歲的驢馬，科爾沁人叫做 esgel örije 是現代蒙語中普遍實用的常用詞。賽音夫同志對此句曾解釋道：「此句的詞幹是個動詞『額思格胡 esgehü』，割或取掉的意思。蒙古人將公馬一般四歲時閹割，所以將四歲驢馬叫做 esgel 或 esgel örije，科爾沁地區將此名詞當作專用名詞了。」¹³

「合里兀 haliGun」是指毛色，呼倫貝爾地區將「合里兀」—海驢，也叫鼠灰色。所以原文「額思格勒合里兀 esgel haliGun」應譯作「四歲的海驢驢馬」為宜。

（五）第三卷 124 節記載：鐵木真被推舉為蒙古部可汗後命阿兒孩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察兀兒罕四人「豁刺因、豁幹察黑、幹亦刺因、幹多刺、孛勒禿孩」。新譯漢文《秘史》將此句譯為：「你們當我遠程的遠箭，射程的近箭」。筆者認為「豁幹察黑 hoGucag」是時間、期限、約定之意；「幹多刺 odora」是前頭、當先（打獵或圍獵時把獵隊分兩排，排兩頭當先的叫做「幹多 odo」，排中間的叫做「塔乞勒札豁兒 tagiljaGur」，中央部分為「禿孛 түб」）。所以原文「豁刺因、豁幹察

¹³ 那貴賽音夫：「額爾登泰的蒙古秘史校勘本遺稿」，第 40 頁，《蒙古語客》，第六期，1981 年。

黑、斡亦剌因、斡多剌」是比喻使者或聯絡者而言的。鐵木真做了可汗以後便任命阿兒孩合撒兒四人爲使者，並命塔孩、速客該二人作爲使者前往客列亦惕部王汗處（《秘史》126 節），命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二人作使者到札木合處（《秘史》127 節）。並且塔孩等四人在成吉思合罕的創業事業中一致任使者、使臣的官。

（六）第四卷 135 節記載：成吉思汗與客列亦惕王汗一起戰敗塔塔爾部後在塔塔兒人的營盤裡撿到一個戴著金耳環「朵列卜赤禿」的小男孩，成吉思可汗把他交給訶額倫母親收養。這便是以後的棟樑大臣失吉忽都忽。三種漢文版本把「朵列卜赤禿 *dörebčitü*」一詞譯爲「金項圈」。「朵列卜赤禿」是鼻銅子，（環、鼻環；穿牛和駱駝鼻子用的小橫木）。額爾登泰、烏雲達賚在《秘史詞彙選釋》中解釋道：現在據不全面調查只發現：「原藉西烏珠穆沁旗，現年（1974 年）83 歲的陶郭札布老翁在他幼年時曾經戴過鼻環。」¹⁴所以塔塔兒部營盤撿到的失吉忽都忽當時也是戴著鼻環的。

（七）第六卷 184 節記載：王汗毫不介意的，正立起「阿勒壇·帖兒蔑」舉行宴會。新譯《秘史》版本依著旁譯將「阿勒壇·帖兒蔑 *altan term-e*」譯爲「金撒帳」，並作了解釋。學術界將「帖兒蔑 *term-e*」均認爲是「撒帳，或一種毛造品（細毛布）」。「據筆者考察新疆和青海、內蒙古額濟納、阿拉善等地，均稱 *term-e* 爲蒙古包「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支架、牆、壁、牆壁）。

小說《烏巴升洪太吉傳》中這樣寫道：「五虎大將長兄，和碩特部白巴嘎斯可汗，統率著一萬六千名勇士，端坐在十五個哈那（*term-e*）的輝煌的宮殿裡……。」長篇史詩《江格爾》中多次出現「帖兒蔑」一詞，都是哈那（牆、牆壁）的意思。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色道爾吉譯的《江格爾》也都譯爲「哈那」。如：《雄獅洪古爾的婚禮》一章描寫江格爾可汗的宮殿時寫道：

明彥和薩納拉，

提前三天回到寶木巴，

¹⁴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蒙古秘史」詞彙解釋》，第 285 頁。

在那遼闊的西墨爾海濱，
在西克錫力克的毡房北面，
搭起了寬敞的毡房，
有四十四根哈那，
有四千條渥渥（串子），
用虎皮包裹毡房的圍牆。…

《秘史》第十二卷 265 節中出現「帖兒蔑、格兒禿、驢蔑延、阿赤阿禿」的詞句。這是把西夏唐兀惕部的「撒帳 term-e」，按蒙古語說成「帖兒蔑 term-e」。所以，以上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帖兒蔑 term-e」，便是哈那，是無可非議的。

三種漢文版新譯「蒙古秘史」中。有一些歷史事蹟的解釋和年代的說的方面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因篇幅有限，省略。本文僅供「蒙古秘史」漢文版作者讀者參考¹⁵。

¹⁵ 本文多於札奇斯欽教授教授「新譯並註釋蒙古秘史」引證，因為謝氏、道氏版本無法引證也。

隋唐盛世胡風熾

劉學鈞

中原大學教授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而且綿延不絕，五千年一脈相承，就以秦始皇統一天下的西元前 221 年開始算，到目前的二十一世紀，歷經了二千一百多年，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從來沒有滅絕過，從《史記》到《明史》，史史相連，也沒有中斷過。其中除了《史記》是通史性質，從〈五帝本紀〉到西漢初年，採紀、傳方式紀錄中國的上古史外，其餘各史都是紀錄一個朝代史事的斷代史，但是在體裁上，仍然採用跟《史記》相同的紀傳體，放眼當今全世界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或民族有像我們這樣悠久而且如此完整紀錄下來的歷史，作為中國人，這是一分難得的驕傲。雖然清朝退位已經近一百年了，經國家核定的清史還有沒面世，這或許因為自民國初年以來，國家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不過近半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都沒有發生重大的戰亂，而且經濟都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傳統是盛世修史，最近據報載大陸史學界準備集結人力跟財力，要開始編修清史，以便延續中國為前朝修史的傳統，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看到《清史》問世。

在中國歷朝歷代中，最值得向世人誇耀的，莫過於漢、唐了。如果論其在文化上的表現，以及對後代的影響，唐又勝於漢，唐是繼承隋而來的，隋祚短暫，就長遠的歷史發展看，隋朝似乎是為唐朝的建立作準備，就歷史文化而言，隋唐是連成一體的，隋祚固然短暫，但歷史上仍然有其意義。隋楊廣開鑿運河，如果只是為了方便他冶遊而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固然人人得以口誅筆伐，也因此他死後被諡為「煬」，在國史傳統中，皇帝死後的諡號，雖然只有一個字，可是這一個字卻代表著莫大的意義，像「煬」字，就代表著「好內遠禮」；這個「煬」字讓楊廣背負著千秋萬世的罵名；運河如果從南北運輸的面向看，卻有著貫通南北的功能，在運河開鑿後，一千多年大約十五、六個世紀，它發揮著南北運輸的莫大功能，從這個角度看，隋煬帝楊廣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況下，完成了一件具有

歷史意義的工程。

唐繼隋而立，說起大唐盛世，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情不自禁的產生驕傲感，不錯，大唐盛世多元的文化，使她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多彩多姿的國家，彷彿是夜空天上皎潔的明月，世上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似乎只是閃爍的星星，只是為了襯托著月亮而已，想想看當年大唐京城長安，有著好幾萬個從地球上各個角落來求道問學的留學生、販賣各地物產的胡商，長安是當年世界上最繁榮的「國際都市」，世界上頂尖的商品、各民族的服飾、歌舞都出現在長安的街頭，當年長安的情況就如同當前的巴黎、紐約，但是卻比巴黎、紐約多了份人文氣息跟傳統中國的色彩。隋、唐之所以能夠包融並吸納當時世界上各民族、各國家的多元文化，有其族源的背景。本文在談隋唐吸納胡族（這裡所謂胡族，是非漢人的所有各個民族，「胡」字是個中性的名詞，匈奴單于致書西漢天子時說：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見胡字絕無輕蔑含意，較諸戎、狄、蠻、夷、貊、貉…好多了）文化之前，有必要先將隋、唐始建國者楊氏、李氏家族淵源稍作探討，那麼對於隋、唐的盛行胡風，就會豁然開朗了。

隋代的建國者楊堅以及唐代建國者李淵的先人，都曾經在鮮卑宇文氏的北周任官，而且都出身於北方鎮兵，姑且暫不論楊、李二氏是否胡族，他們染有濃厚的胡族習尚，則是無從否認的事實。在北周時楊堅曾被北周皇帝賜姓「普六茹」氏、李淵的先人李虎則被賜姓「大野」氏，所以在北周時一切官文書，他們應該被稱為「普六茹堅」跟「大野虎」只是記載北周史事的《周書》，是唐代令狐德棻所撰著，就把他們兩個記載為楊堅、李虎了，說他們是胡化的漢人，應該是很客觀的認定。我們如從後來唐代皇室的一些作為，像唐高宗李治公開娶了他父親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娘（後來改名武則天，武曌）、唐玄宗李隆基也公開把他兒子媳婦楊玉環（也就是楊貴妃）納為貴妃，像這類宮廷穢亂，歷朝歷代幾乎都免不了，但是都只敢偷偷摸摸的在暗中進行，像唐代這樣公然將她們娶為后妃的，在正史中還真不多見，我們如果看看北方游牧胡族的婚俗，就自然發現兒子娶庶母是司空見慣的習俗，《史記》、《漢書》、《後漢書》就記載了匈奴、鮮卑、烏桓等胡族，都有這種習俗，縱至十五世紀時，蒙古族元朝

惠宗脫歡帖木兒（也就是漢文史料所說的元順帝，「順帝」這個諡號是明朝給諡的，認為他順天應人退出大都—北京，所以諡之為順帝，但是脫歡帖木兒退出北京，仍然在大漠南北以大元帝國的名義，發號施令，他死後，蒙古人諡之為惠宗）的玄孫滿都古勒台吉（台吉這兩個字看似蒙古語，其實是從漢語「太子」音譯過去的，所以鴻台吉或琿台吉，就是皇太子，這種情形後來滿洲話裡也有，像滿語「福晉」，就是漢語「夫人」的音譯，「夫人」這兩個字如果以閩南語來讀，更接近「福晉」），他的夫人滿海徹辰二十一歲時，滿都固勒台吉就死了，後來她嫁給晚了她四世的族孫巴圖蒙克，也就是後來的達延汗（達延汗一說是大元汗的音轉）。後來蒙古的俺答（或作阿勒坦汗）的妻子三娘子，也在俺答汗死後，嫁給俺答汗前妻的兒子。可見這種習俗在北方胡族中是極其常見的。唐朝李氏一族縱然不是胡族，也染上濃厚的胡風。

唐代的第二個皇帝李世民（死後廟號為太宗），英明有為，威服四周的胡族，於是諸胡族給他上了個「天可汗」這尊號，這個「天可汗」似乎可以解釋為「普天之下的大可汗」，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殊榮，也說明了當時武功文治之盛。唐朝當然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迄今世界華人聚居較多的地方，幾乎都有唐人街，可見唐人幾乎可以成為中國人的代號。唐朝在玄宗李隆基（西元 712~756 年）之前，幾乎都是太平盛世，在當時的整個世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強大而富庶的國家。大唐盛世一則由於皇室染有濃厚的胡族習俗，再則由於自身的強大，所以對自身充滿了自信，也就對一切外來的文化習俗採取開放、接納的態度，因此唐代文化充滿了異國風光，形成多元而璀璨的大唐文化，她所綻放出來的光芒，不僅成為當時世界之最，即使到今天，她的餘輝仍照耀著全世界各角落的中國人。

文化是人所創造出來的，我們先看看唐代的文武大臣有那些是出身胡族，像長孫無忌、于志寧、豆盧欽望、宇文士及、元慎等人都是源於鮮卑族；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是突厥人；契必何力、僕固懷恩、渾滅是鐵勒人（也即敕勒，前身是丁零）；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安祿山、安思順、史恩明是中亞昭武九姓胡人；劉禹錫是匈奴族後裔；白居易是西域胡（極可能是羯族）；論弓仁是吐蕃人（吐蕃，就是後來的西藏）；尉遲勝也是西域胡；李光弼、王武俊是契丹人；李抱真、李抱玉兄弟及駱元光也是西域

人；泉獻誠是高麗人；李寶臣、史憲誠是奚族；李多祚、李懷光是靺鞨人；還有像擅長繪畫的唐薩陀、尉遲乙僧可能是來自中亞的康國；著名的音樂家曹保，也可能來自中亞的曹國；未嘉榮則可能來自天竺（今印度）。這些只是在文獻上容易查到的，史傳未載的可能更多，可見有唐一代用人唯才，不以地域、族別自我設限，在朝爲官或參養在宮廷貢獻音樂、繪畫技藝的胡人既有這麼多，可以想見在民間的胡人，也一定不少；這也許就是大唐文化多元而璀璨的根本原因吧！

人要生存，就離不開飲食，中國自西漢派張騫出使西域後，許多西域的食物就上了中國的餐桌，像張華的《博物志》、《太平御覽》、《續漢書》等歷史文獻，就分別記載以下幾項訊息：

「張騫通西域，乃得蒲桃種。」

「漢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麥、苜蓿、蒲桃，亦以廣地也。」

「（東漢）靈帝（劉弘）好胡服…胡飯…京師貴人，爭競為之。」

從上面所引這幾條史料，可以看出在兩漢開始，許多胡人的食物，已經慢慢在漢人社會傳了開來。三國魏晉之後，北方各胡族紛紛在中原地區建立漢魏或中原式的王朝，這就是一般歷史文獻所稱的「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其實這種說法絕對的不正確，其一，當時不止是匈奴、羯、鮮卑、氐、羌五胡，還有瀘水胡、丁零、稽胡等，所建的國家也不止十六國；其次，自古以來從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原大地只許漢人建立王朝，如果胡人建國，就叫做「亂華」，這種說完全站在漢人本位立場，是不公平的，要談歷史文化，就該站在較公平的角度來談，這是題外，暫且打住。且說自東漢而三國魏晉、南北朝而隋唐，中國人在飲食習慣上融入了許多胡人的食品以及胡人的烹調（或釀製）方法，以往的文獻大部分只作籠統的記載，如《續漢書、五行志》只記載東漢靈帝好「胡飯」，至於「胡飯」究竟是什麼樣子，就不甚了了，可是到隋唐，對於胡飯就有了較詳細的描述了，據唐人段成式所撰的《酉陽雜俎》（此書共二十卷，另有續集十卷，分門輯事，極具參考價值），就具體的指出當時唐朝富貴人家所流行的「胡飯」叫做「畢羅」，由於是食物，所以就寫作「饌羅」，這畢羅或饌羅，經過近代專門研究東西文化交通的向達的考證，他在所著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指出：所謂畢羅是波斯文 pilaw 的食品，沿絲

綢之路，傳入中國，而所謂 pilaw，在中亞跟天山南北，也讀作 palauv，傳入內地後，稱之為「抓飯」，它的作法是以牛肉或羊肉或雞肉，加在米飯中，再加上洋蔥、蕃茄、胡蘿蔔（請注意這三樣物品有洋、蕃、胡字，已經說明不是中國本土的食物，都是外來的），以一般煮飯的方式煮出來的飯，就叫做畢羅（抓飯），畢羅（抓飯）無論在色、香、味上，都能滿足人們視覺、嗅覺和味覺。在突（厥）回（紇）民族裡，這是極其普通的主食，傳來中土後，竟成為唐代社會上富貴人家的一道佳餚。

至於一般菜餚，據北魏高陽太守賈思勰（勰、音協，意為同心協合）所著的《齊民要術》這本書，提到許多北方胡族的食物，都流傳到漢地來，按賈思勰係北魏後期至東魏（西元 534~550 年）時撰成該書，下距唐盛世不過百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期為西元 627~649 年），《齊民要術》中所提到的胡族食物，必然仍在大唐社會流行，據《齊民要術》說到的胡族食物計有以下幾種：

羌煮，這道菜顧名思義就知道是來自羌族，羌族在諸胡列國時代（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五胡十六國）建有後秦，這種羌煮在後秦宮廷裡可是一道珍貴的佳餚，據說常吃還具有養顏美容、壯陽的效果，它的作法是先將一個煮好的鹿頭，用水沖洗乾淨，然後切成兩指大小，再將豬肉剁成肉醬，用蔥段、薑丁加上橘皮以及少許辣椒，跟切好的鹿頭肉放在鍋子裡加水，加醋、加豆豉一直煮，煮到軟爛為止，據說吃起來比牛肉嫩，聞起來比羊肉香。當然這道佳餚不是一般人吃得起，必得官宦富貴人家，才有資格品嚐；無論隋朝的普六茹氏（楊氏）或唐朝的大野氏（李氏），都是胡化了的漢人，必然對這道美食不會沒有嘗過，後來貴為帝王，要品嚐這道美食，應該是輕而易舉的。

貊炙，從這菜名也了然這也是一道胡人的食品，不錯，它確是北方胡族經常食用的佳餚，通常叫做烤全羊或烤全牛，只是富貴人家只取牛、羊身上最嫩的部位，烤到六、七分熟，既鮮嫩又多汁，在隋唐時代富貴人家流行著貊炙。原先北方游牧胡族，對餐具不甚講究，因為他們逐水草而居，陶瓷製品容易破碎，所以多以木碗裝盛，可是到了北朝隋唐就不同了，對盛放貊炙的盤子，就極為講究，一定用精細的瓷盤，而皇家或高官貴族，更使用由波斯進貢的雕花銀盤，這種專門用來盛放貊炙的盤子，稱

之爲「貊盤」。

自然在烹用羌煮、貊炙這類佳餚時，雖然極爲香美可口，但是也會覺得相當的油膩，西域胡族的飲食，自有其配套的方式，油膩的菜餚配上香醇的佳釀，可以說是天作之合，西域盛產葡萄，以葡萄釀成的美酒，讓人聞到了就垂涎欲滴，如果把美艷的葡萄酒傾倒在夜光杯裡，在明亮的月光下，慢慢品嚐著，光是這個氣氛，就令人陶醉不已，無怪乎唐詩裡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令人誦吟千古的名句了。即使時至今日，葡萄酒在酒的世界裡，還是居於相當高的地位。唐人好酒，尤以葡萄酒爲最，君不見詩仙李白（一說他生於中亞）的大作裡，提到酒的非常多，一首〈將進酒〉，更是傳唱千古，這首詩是這樣子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

與君歌一曲，諸君爲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譔謔。

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酒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唐代除葡萄酒外，還有源自波斯的「三勒漿顏酒」，所謂三勒者，是指黃摩勒、毗梨勒及河梨勒而言，可惜文獻不足，無法將三勒漿顏酒，作較詳細的描述。此外，還有將羊髓加在酒裡面，加溫後飲畢，這種酒稱之爲丑未觴，這丑未觴很可能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相當的關聯。唐人飲酒對酒具也很講究，製作酒器的材料也有很多是來自胡族的，像玉、瑪瑙、琥珀等，詩人李白的〈客中行〉就提到玉作的酒器，如：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至於酒器的形狀，也是千奇百怪，如以瑪瑙製作形如牛頭且鑲上金泊的酒杯（如附圖）

，另有稱為「叵羅」的酒杯，它真實形狀，目前已經難於瞭解，但是從名稱上看，可以肯定來自西域胡族。早在北齊時，這種叫作叵羅的酒杯，就傳到漢地來了，據《北齊書》卷三十九〈祖珽傳〉裡，就記載了這種杯

鑲金牛頭瑪瑙杯

子，大意說有一回高歡賜宴僚屬，用的是叵羅杯，後來發現遺失了一個，於是就命所有參加宴會的人都脫下帽子檢查，結果在祖珽的頭髮髻中，找到了遺失的叵羅杯，所以我們可以想見這種叵羅杯一定很小，否則無法藏在髮髻裡。李白有一首〈對酒〉詩，就提到叵羅杯，叵羅有時也音譯為頗羅，這首詩也提到葡萄酒：

「葡萄酒，金叵羅。

吳姬十五細馬馱，

青黛畫眉紅錦靴。

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裡醉。

芙蓉帳底奈君何？」

可見在大唐盛世社會上的飲酒文化，滲進了一股胡人風氣。

至於在歌舞娛樂方面，更是瀰漫著濃濃的胡風。按隋、唐皇室都是出身於鮮卑宇文氏北周的軍鎮，姑不論楊、李兩家是否胡族，但是染有胡族文化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隋、唐時的音樂，有雅樂跟俗樂兩種，所謂雅樂就是中國傳統的廟堂音樂，多半用鐘、鼓類打擊樂器，單調缺少起伏；歌、辭則多是仿古體的詩句，義正而辭嚴，說好聽些是莊嚴肅穆，說白些是單調而無趣，所以除了國家祭典或朝會時，不得不用外，平常時候跟一般民間是不用雅樂的。而俗樂就活潑多了，俗樂中以燕樂（也稱宴樂）為主，顧名思義是在宴會使用的音樂，隋、唐時國家設有專管音樂的機構，如太常寺、教坊司、梨園等單位，集中了大批優秀的音樂跟舞蹈的藝人，從事各種演藝活動。隋朝初期，燕（宴）樂設七部，這七部是：

- 1.國伎（就是西涼伎）源於河西地區。
- 2.清商伎（是傳統民間創作，以表現男女愛情及離別之情為主）。
- 3.高麗伎（就是朝鮮，也就是現今的南北韓）。
- 4.天竺伎（天竺就是印度）。
- 5.安國伎（安國在西域，其地當今中亞的布哈拉）。
- 6.龜茲伎（龜茲讀作丘資，地當今新疆沙車跟庫車二者之間）。
- 7.文康伎（用於典禮或宴會結束時）。

試看以上這七部樂裡，除了清商、文康兩部是漢人或中國傳統音樂外，其餘五部都是胡人的音樂，不止如此，其間未能成爲一部的還有康國、突厥、倭國（今日本），百濟、新羅（以上兩者都在今朝鮮半島），疏勒、扶南（今柬埔寨）等地的音樂，都在中原流行。到隋煬帝楊廣時，將這些音樂加以調整，擴大編制爲九部，就是清樂（爲原來的清商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地在今中亞）、疏勒、安國、高麗及禮畢（就是原來的文康伎）九部，在這九部伎中，有七部是胡樂，可見在隋代的民間俗樂，是以胡樂爲主。

到了唐代，唐初一百多年國泰民安，經濟繁榮，而唐代皇室又是帶有濃厚胡族文化，對於源自胡族的音樂，很可能打心裡就具有一份偏愛，到了唐玄宗李隆基（西元 712~756 年）時，他本人更精通音律，所以特別喜愛音樂，擴大了教坊的規模，分爲內、外兩個部分，外坊在長安設了兩所、洛陽也設兩所，內坊和梨園則設在宮廷裡，都不屬於太常寺，而由宮廷派內官管轄。唐代更將音樂的範圍從九部擴大爲十部，這十部是：

- 1.燕樂
- 2.清商樂
- 3.西涼樂
- 4.天竺樂
- 5.高麗樂
- 6.龜茲樂
- 7.安國樂
- 8.疏勒樂
- 9.高昌樂

10. 康國樂

從上列十部樂伎裡，很清楚的看到除了燕樂跟清商樂外，其餘八部全是胡樂，從音樂上看，說隋唐時代胡風熾盛，應該是很寫實的。

相傳唐玄宗因為喜好音樂，又深諳音律，他曾依照天竺傳來的舞姿創作了〈霓裳羽衣曲〉據說是當時西涼總督楊敬述向唐玄宗進獻《婆羅門曲》，唐玄宗既精於音律，又深通舞蹈，所以就改編出〈霓裳羽衣曲〉，當曲成時，命楊貴妃翩翩起舞，但是缺少詞，沒法唱出來，所以臨時命人去找李白來填詞，可是李白此時正在酒樓中買醉，被請來時酒醉未醒，很費了些力氣，才把李白弄醒，只見李白即時寫下了千年不朽的〈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霓裳羽衣曲〉既然創作的源頭來自

《婆羅門曲》，自然帶有印度的色彩，

霓裳羽衣舞

詳細曲譜已經不可考了，不過可以想像必然是輕快活潑，唱的人固然可以一吐胸中鬱悶之氣，聽的人也能聽音會意，舒暢身心。至於霓裳羽衣舞，顧名思義，必然是曼妙而輕快，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飛天」可以領略些許，四十幾年前，此間曾有藝術家根據相關文獻創作了霓裳羽衣舞，今（2005 年）年，台北藝術大學又依據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印象，再度編出此舞，從圖片中看華麗有餘飄逸似乎不足，如果能多參照些莫高窟「飛天」的舞姿，可能更能表達原創者唐玄宗所冀求的神韻；此外，據文獻記載，純然來自胡族的歌曲像〈穆護砂〉，唐人張祜有一首詩這樣形容的：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

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見《全唐詩》卷五百十一）

這曲〈穆護砂〉似乎是用玉作的洞簫吹出來的，但是據宋代洪邁的考證，「穆護」應為「木瓠」的諧譯，是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歌舞，洪邁在他所

著的《容齋隨筆》四筆卷八中有〈穆護歌〉一條，詳細考證說明〈穆護砂〉源於西南地區，敲擊木瓠以爲歌舞的節奏（見《容齋隨筆》頁 703~7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可見唐代不但從西北地區引進胡人的樂曲，也從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引進他們的樂舞，可見唐代的音樂舞蹈是極其多彩多姿。

提起舞蹈，隋唐盛世對自身的文治武功充滿了信心，所以對外來的各種文化，都以開朗的態度加以接受。中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拙百家以來，儒家思想成爲社會的主流，儒家思想當然極其優秀，但用在日常生活上縱然也有歌舞，但歌詞嚴謹，舞姿拘束，會使人覺得過於嚴肅、端莊，喜慶宴會如果都不

躬鮑鮑

銅胡騰舞俑

苟言笑，會覺得無法盡性盡興，而西北邊疆胡族，面對一望無盡的大草原，天生豁達樂觀，只要酒足飯飽，都不會去想明天的憂愁，所以他們的舞蹈開朗活潑，動作誇張，給人一種盡情奔放的感覺，一曲舞罷會令人覺得釋放掉身心的疲勞，所以傳入中土之後，很快就爲中原人土所喜愛，來自西域石國的胡騰舞，舞姿狂放，似乎要把全身的精力都釋放出來。另有胡旋舞，也是來自西域，顧名思義，此舞重點在於旋轉，最初可能只有到內地的胡族女子在跳，由於胡族女子高躬的身材、輕盈的倩影、曼妙的舞姿，相當的吸引人，慢慢的漢人女子也開始學著跳，相傳楊貴妃雖然體態豐腴，但是她善於跳胡旋舞，而安祿山儘管身材近於癡肥，據說他肥胖到肚皮垂到胯間，但是跳起胡旋舞，卻能旋轉自如，顯得無比的輕盈，所以楊貴妃很喜歡跟安祿山共舞。據文獻記載，唐玄宗天寶年間（西元 742~756 年），西域康、米、史諸國進獻「胡旋女」舞蹈時，舞者站在錦毯上旋轉不已，快如旋風令人目不暇給，煞是好看，縱然時至今日我們看中亞各國的舞蹈時，仍然可以看到舞者不時的快速旋轉，這舞很快的在長

安以及一些大城市傳了開來，大家知道唐玄宗天寶時，國力已大不如前，而社會上一般民眾或政府官員卻毫無警覺，依然沉緬在這種舞蹈之中，後來白居易曾作了一首〈胡旋女〉的詩，諷刺天寶年間社會紙醉金迷情形，這首詩是這樣的：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

胡旋女，出康居。

徒勞東來萬餘里，中原自有胡旋者。

聞妙爭能爾不如，天寶季世時慾變。

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

人人最能道胡旋，梨花園中冊作妃。

金雞障下養為兒，祿山胡旋迷君眼。

兵過黃河疑未返，貴妃胡旋惑君心。

死棄馬鬼念更深，從茲地軸天難轉。

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楊貴妃畫像

白居易這一首〈胡旋女〉，其本意雖在諷刺當時社會一片胡風。但是詩裡卻告訴了我們許多「第一手」的資訊，白居易是唐代人，離楊貴妃時不遠，在詩裡明白指「胡旋女，出康居」，按康居就是康國，屬昭武九姓之一，考其地望大約在今天中亞薩瑪爾罕之北一帶地方，現在中亞烏茲別克共和國；唐高宗李治永徽年間（西元 650～655 年），曾在其地設立康居都督府，胡旋舞或許就是在那個時期傳入中土，到了玄宗時大為流行。又從詩中知道跳胡旋舞時，要跟著弦樂的拍子，鼓聲不停的旋轉，既向左旋又向右轉，光憑想像，就可以知道這種舞動作極為誇張，舞姿極其活潑而且輕盈，旋轉時雙手高舉（白詩中的「弦鼓一聲雙袖舉」），衣袖下滑露出如凝脂白藕的手臂，隨身體旋轉而搖擺不定，充滿了動態美。無怪乎在盛唐時，能讓中土人士迷戀不已。此外，唐詩人岑參（南陽人，天寶間

進士）也有一首詩像是讚美胡族的舞蹈，茲將全詩引錄如次：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

高堂滿地紅氍毹，（氍音瞿，氍毹是毛或毛麻混織的布或地毯，在這裡顯然是指地毯而言）

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

諸客見之驚且歎，慢臉嬌娥纖復穠。

輕羅金縷花葱籠，回裾轉袖若飛雪。（裾，衣之前襟，即大襟）

左鏐右鏐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匝。（鏐，音產，鐵把短矛）

花門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

白草胡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

前見後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此。

采蓮落梅徒聒耳，世人學舞祇是舞。

姿態豈能得如此。

（詩題〈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鏐歌〉見《全唐詩》頁 2057）

可見岑參所看到的這個舞固然由胡人傳入，但是卻帶有戰鬥性質，詩中有「左鏐右鏐生旋風」句，很可能是北方胡族揮舞武器的一種舞姿，岑參覺得這種既有輕柔委婉的一面，又有虎虎生風充滿陽剛的另一面，跟漢人原有的「採蓮」（采同採）、「落梅」舞曲，有絕大的不同，採蓮、落梅只不過是一種舞蹈罷了，而這來自胡族的舞蹈，確能令人大開眼界，大有此舞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之感，唐時對自我的各方面成就，充滿了自信，所以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奇風異俗，都不加以排斥，展現了泱泱大民族的風度，正應了所謂：「泰山不讓土，乃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的氣概，這也許就是隋、唐文化特別璀璨亮麗的一個原因吧！

隋、唐時流行的樂器，有許多都是來自四周的胡族，像胡笳、琵琶、箏、篳篥等等都是來自胡族，下邊附圖的六人「樂隊」陶俑，似乎只有最右邊的一個是吹著漢人傳統的笙，其餘五個人的樂器都是來自胡

族。岑參有一首〈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詩，也可以看到當時胡樂的盛行，全詩如下：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

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將送君，奉山遙望隴山雲，

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從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六窟壁畫中（如圖）可以很清楚看到三個舞者的舞姿都是活潑而誇張的，揮動著長長的水袖，跟現代藏族的舞蹈有幾分神似，基本上還是一片胡風。

唐代樂舞圖

在戶外體能活動方面，在唐代打馬球可以說是一項很普遍的戶外活動，有人說打馬球是中國自古就有，傳統的戶外活動，這種說法未必正確，如所周知，北亞草原游牧各民族都是騎馬的，所以打馬球應該是源於北方胡族的體能活動，這運動參與者都騎在馬上，手裡拿著像現在打曲棍球的棒子，在馬匹奔馳中，以棒子打球，不讓球落入對方控制之中，可能雙方各自有一個「球門」，要把球攻入對方的門中，就算勝了一局，或許跟今天足球或美式足球相當類似，只是難度高多了，因為打馬球的基本條件是要騎在馬上，追逐著球，所以要有很好的騎術，否則無法進行這種遊戲。相傳唐玄宗李隆基就擅長打馬球，他還是王子時，就是打馬球高手，據封演在他所撰的《封氏聞見記》一書就盛讚李隆基打馬球時「東西馳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此處係轉引自孔憲易〈漫話北宋官廷女子馬球隊〉一文，原文刊於《學林漫錄》

十集，中華書局 1985 年 5 月出版），可見李隆基並非只知吃喝玩樂、弱不禁風的王孫貴族，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帝王。

打馬球這種充滿陽剛之氣的運動，不但在男子中風行，後來女子也

流行打馬球，當時劍南節度使就設有女子馬球隊（劍南節度使南道爲十道之一，考其地望約在今四川省，唐憲宗李純元和之後，分設爲西川、東川兩節度使），據舊《唐書》卷六十七〈郭英乂列傳〉就提到「一聚女騎驢擊球，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可見唐代西南地區女子也流行打馬球，想來唐宮廷中或許也有女子馬球隊，可惜文獻中沒有記載，這種女子打馬球的風氣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時期，後蜀時宮廷中也還有女子馬球隊，後蜀花蕊夫人費氏曾有一首宮詞提到女子馬球，是這樣子的：

「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抑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隊，遍遍長贏第一籌。」

從這首宮詞中可以發現不但後蜀宮廷（時稱官家）有女子馬球隊，民間顯然也組有女子馬球隊，兩者比賽時，都是宮廷女子馬球隊得勝，這或者是宮廷隊訓練有素，也可能是本諸「民不與官鬪」的傳統「讓」官家隊「

女子打馬球

遍遍長贏第一籌」。只是無論唐時或五代十國時，女子打馬球，所騎的不是馬，而是驢，其中原因可能由於馬的速度快，女孩子尤其漢人女孩難以駕馭，而驢性魯鈍，容易操控，也可能是由於四川這個地方不產馬，所以改騎驢。不管怎樣，這源於胡族的運動，在唐代乃至後來的五代十國都很流行，甚至到北宋時也還流行，之後就慢慢沒落了，其原因很可能是這種運動過於浪費，過於貴族化了。

打馬球是激烈的活動，至於靜態方面的娛樂，也有源於胡族的，像雙陸（或作雙六），這種遊戲類似棋類，相傳這種遊戲源於天竺（今印度），在北魏後期就傳入中土，起初叫做「握槊」，到隋唐時大爲流行，棋盤左右各有六行道，

唐代打馬球陶俑

所以叫做雙陸，兩人對弈，各有十五只馬，馬作椎形，分黑白兩種有點像後來的西洋棋，兩人分持黑白，用擲骰子，勝者（點數大的）先行，白

馬從右到左，黑馬從左到右，看誰先將馬走到反方向，就算贏了，從玩法看，又有點像今天的跳棋，只是跳棋可以三個人玩，而雙陸只能兩個人對博。當時雙陸極為流行，因為設備簡單，場所不拘，宮廷或富貴人家，雙陸的棋子可以沉香木甚至象牙雕刻而成，一般老百姓用普通木材也未嘗不可，所以很容易普遍化，當時人認為雙陸是智者的遊戲，像王梵志在詩中就說：「雙陸智人戲，久後與仙通。」據史傳所載，武則天曾經將他兒子李顯（中宗）貶為廬陵王，有一天武則天對宰相狄仁傑說：「我昨天夜裡夢見跟人家玩雙陸，不勝，何故？」狄仁傑回答：「雙陸不勝，宮中無子故也。」狄仁傑暗喻武則天年歲已老，還沒有指定繼承人，形容宮中無人，當迎李顯回朝，可見原本只是遊戲的雙陸，居然可以被狄仁傑借用來暗喻繼承問題，可見狄仁傑一定也善於玩雙陸之戲。又相傳有一回狄仁傑跟武則天的男寵張昌宗對賭雙陸，張昌宗以翠毛裘、狄仁傑則以朝服為賭注，連狄仁傑都好雙陸，可見唐代一般人必然也喜好雙陸。

另據史傳所載，唐中宗李顯在位時（西元 705~710 年），韋皇后跟武三思在宮內玩著雙陸之戲（相傳韋皇后跟武三思有染），中宗站在一旁觀看，而且興致勃勃為皇后點算籌碼，可見在唐代宮廷之中，也流行雙陸，由於雙陸的棋子刻著馬的形象，所以玩雙陸之戲，又稱為「打馬」，宋朝李易安曾撰有《打馬圖經》中曾指出：「打馬爰興，樗蒲遂廢，實博弈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這個李易安是否就是「詞中三李」之一的李清照（李清照字易安居士），雖不敢確定，但雙陸確實已在民間大見流行了。

唐・宮人奕/雙陸圖

唐時在音樂方面，除了許多樂曲來自域外胡族，在樂器方面，胡族樂器在中原也大見流行，詩人張祜曾有〈觿策（或作簞策，同觿策、觿、簞、均音畢）〉〈箜篌（音空侯）〉及〈邠娘羯鼓（邠音賓）〉三首詩，這幾種樂器都是來胡族，現在且將〈邠娘羯鼓〉一詩抄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唐時在音樂方面，除了許多樂曲來自域外胡族，在樂器方面，胡族樂器在中原也大見流行，詩人張祜曾有〈觿策（或作簞策，同觿策、觿、簞、均音畢）〉〈箜篌（音空侯）〉及〈邠娘羯鼓（邠音賓）〉三首詩，這幾種樂器都是來胡族，現在且將〈邠娘羯鼓〉一詩抄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新教邠娘羯鼓成（邠是陝西省縣名），大酺初日最先呈（酺音僕，聚宴爲酺）。冬兒指向貞貞說，一曲乾陀兩杖輕。」（見《全唐詩》頁 5840）可見唐時鼙、箜篌、羯鼓在中原已經是很常見的樂器了。說到羯鼓，自然是指羯族的鼓了，而羯族，在這有必要酌加說明，以往文獻總認爲羯族是匈奴「別支」、或「別部」，不錯，在中國境內的

鮑

箜篌

羯族，確實是匈奴強盛時所統治諸多部族之一，但是他不是匈奴族，諸胡列國（一般文獻稱之爲「五胡十六國」）時，建立後趙的石勒，就是羯族。據《晉書·載記》等史料，明白指出羯族的體質特徵是「深目、高鼻、多鬚」，跟匈奴絕不相同，筆者曾在拙著《五胡史論》（台北南夫書局，2001 年 10 月出版）一書中，考證羯族又叫拓支、拓枝、拓折，乃是源於今天的中亞，是西域胡，或者稱爲西胡。兩漢匈奴強盛時，曾經征服西域各國，將他們能征善戰的青年，俘擄到東方來，西域胡稱健勇者爲拓羯，到了東方後，就稱之爲羯族，但是「拓枝」這個名詞依然存在，到唐朝時還用這個詞。由於羯族或拓枝是西域胡，在體質表徵上跟漢人不同，可能五官比較立體感，會使人有「驚艷」的感覺，也可能因此唐代官宦或富豪之人，多喜歡參養拓枝女子爲歌舞妓，甚至娶她爲妾，唐時詩人李群玉（澧州人）就有〈傷拓枝妓〉的詩，詩是這樣的：

「曾聞雙鸞舞鏡中，聯飛接影對春風。

今來獨在花筵散，月滿秋天一半空。」

此外詩人張祜也有一首感歎拓枝妓，詩的名稱是〈感王將軍拓枝妓歿〉，全詩爲：

「寂寞春風舊拓枝，舞人休唱曲休吹。

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

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

今來座上偏惆悵，曾是堂上教微時。」

其中第二句「舞人休唱曲休吹」，有的版本作「美人停舞曲停吹」似乎更

爲傳神，試想身材高躬而體態輕盈，面貌既具立體感，而又細白嬌艷的拓枝美女，此時不再唱歌了，而且音樂也停了下來，只見這拓枝美女「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這是一幅何其浪漫，何其引人遐思的畫面啊！在古代妓不必然等於娼，妓有時候只賣笑不賣身，所以有時也寫作伎，而娼則既賣笑又賣身，兩者是有點差別的。從上引兩首唐代有關拓枝妓的詩，不難想像官宦人家或殷商巨賈，不無在家中豢養了一個或者好幾個拓枝歌舞妓，平時有客來訪，在把酒言歡之餘，讓這些拓枝妓出來獻歌獻舞，必然能夠增加賓主間的情誼，如果在情不自禁時，未必不會要拓枝妓薦枕侍寢，這樣不但胡漢文化（音樂舞蹈）交流了，胡漢民族的血統也融合了，本文認爲隋唐時期胡風熾盛，應該是站的住的說法。

盛唐時既然流行胡族歌舞，一般官宦富貴人家，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豢養一批像拓枝妓之類的胡族歌舞妓，民間一般人雖然無力負擔豢養胡族歌舞妓，但是也會尋找「大眾化」或「平民化」而又富胡族色彩的歌舞娛樂，當時民間流行脫渾舞，相傳此舞來自西域，舞蹈者出場時，穿著彩色衣服，騎著高大的馬（西域馬高大，蒙古馬矮小），各自拿著旗幟，當鼓聲響起後，這些舞者下馬，戴上面具，這時把一件件衣服脫下，直脫到赤裸爲止，然後彼此在對方身上潑水，一方面要潑水在對方身上，一方面又要躲閃對方的潑水，形成跳躍追逐，而且這種遊戲都是在冬季舉行，可以說是男子力與美的表示，因爲是在冬季舉行，所以又叫做「乞寒」，又由於表演者幾乎都是胡族，所以也叫做「潑寒戲胡」。雖是肢體活動的舞蹈，但是也配以音樂，稱之爲〈蘇幕遮〉，舞則稱爲〈脫渾〉，唐中宗李顯就很欣賞脫渾舞，就曾經在上元（就是正月十五，現在多稱元宵），親到宮城的門樓觀賞，可見在唐時呈現力與美的脫渾舞相當的流行，只是有些守舊的士大夫認爲這種赤身露體的舞蹈，跟傳統的禮俗不合，上疏請朝廷廢除，玄宗李隆基時，也曾下令禁止，雖然如此，民間卻仍然私下在寒冬中進行這項遊戲，可見胡族的遊戲滲到漢人社會中非常的普遍。

至於「蘇幕遮」或作「蘇莫遮」、「颯磨遮」「蘇摩遮」，原是梵語（即今印度語），從天竺傳入西域，再由西域傳入中土，是樂曲的名稱，後世引申爲詞牌名，唐時從龜茲傳入，唐詩人張說曾有一詩，說出了「蘇摩遮」的由來，共五首→如下：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鬚。
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
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舞送寒來。
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
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論。
往年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

從上引張說這五首詩中，可以看出蘇幕遮在初唐盛行的情況，按張說（西元 667~730 年）生於唐高宗，經武則天的周、而中宗、溫王（李重茂，僅一年）、睿宗（李旦）至玄宗，前後六主，也正是所謂的「盛唐」，蘇幕遮都流行著。現代日本人還流行著在寒冷的天氣中，成年男子裸身在冷水中嬉戲的習俗，是否由唐時傳入日本，似乎也有加以探討的價值，按日本許多習俗都源於唐朝。脫渾舞之所以在中國絕跡，可能跟唐宋理學家（道學家）興起大有關聯，這些道學先生們認為脫渾舞赤身裸體不成體統，透過各種方式加以禁絕。不過我們如果看日本人在寒天中裸身戲冷水，絲毫看不出有什麼色情的意含，道學先生們確實多慮了。

從以上所說的一些事例，只是文化習俗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已經可以很輕易的看出隋唐盛世，社會上瀰漫著濃濃的胡族風俗，如果要全面加以探討，很可能要寫成好幾本專書，本文只是作概括性的介紹，就此打住。

新會員名錄

姓 名	性 別	族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學 經 歷	現 任 職 務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劉芳育	男	漢	53.02.12	中國醫藥學院 政大民族所	中醫師	新店市民族 路103號	02-2936-0246 0917-797088
王永一	男	漢	53.01.19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碩士 (東北民族專 攻) 韓國高麗大學 校文學博士 (韓國史專攻 / 中韓關係史 研究) 興國管理學院 歷史學群教授 慈惠醫護技術 學院(籌備 處)歷史學群 教授	慈惠醫護技 術學院(籌 備處)歷史 學群教授	永和市仁愛 路141巷9號 2樓	0915-901071
胡進杉	男	漢		政治大學邊政 研究所	故宮研究員	台北市至善 路故宮博物 院	02-2881-2021
吳天泰	女	漢	49.04.09	美國俄亥俄州 立大學人類學 博士	東華大學教 授	花蓮縣壽豐 鄉大學路二 段10號	03-8635761
詹景陽	男	漢	63.03.23	台大國家發展 研究所博士生		宜蘭市復興 路三段8號	03-9354610 0933-984517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理事長聯絡地址及電話更動

新店市溪園路 385 號 C1, 8 樓 電話：(02) 8218-0272

本協會理事粘聰明大律師令郎家華先生
於 94 年 1 月 15 日迎娶嬌妻特此致賀。

本協會理事閻秉恆先生令郎嘉龍先生於
94年3月27日喜獲美眷一併致賀。

中國邊政協會 敬賀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真理，天不怕。（白族）

真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彎，真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真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寶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學懶三天，學勤三年。（仫佬族）

人勤，荒坡生寶；人懶，農田生草。（毛南族）

蠢人靠幸福過日子，智者靠勤勞過日子。（苗族）

快樂和汗水是兄弟，幸福和勤儉是一定。（白族）

要想有吃穿，必須勤動彈。（畲族）

勤問路的人，不會迷路。（德昂族）

鐘錶靠發條，發家靠勤勞。（土家族）

手勤能致富，話多生事故。（景頗族）

憐憫惡狼的人，反被惡狼吃掉。（烏孜別克族）

臉上無光身有病，眼裡無光心有病。（哈尼族）

英雄難得戰時伴，年邁難得兒時伴。（哈薩克族）

穀在於幼苗，人在於幼年。（撒拉族）

一棵樹不能萬世長青，一個人只有一段青春。（鄂倫春族）

笑一笑，不讓老；跑一跑，病沒了。（維吾爾族）

獨樹難擋風，獨木難取暖。（蒙古族）

只顧自己，不算好官；脫離眾人，不算好漢。（哈薩克族）

虎怕離心，人怕孤單。（布依族）

夜鶯思念草花，人民熱愛國家。（烏孜別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